

第 12 卷第 1 期 2019 年 4 月

Vol. 12, No. 1, April, 2019

国际高等教育

国际化与跨国发展

高等教育国际化：过去与未来.....	1
品牌之战：独立的海外“美国”大学.....	3
跨国高等教育的定义	6
引入国际分校助力埃及高等教育发展.....	8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国大学的海外分校.....	10

国际主题

忘记竞争的比喻吧	12
衡量全球排名中的教育质量：可能性是什么？	14
世界一流大学与共同利益.....	17
给予难民高等教育机会：为融合铺平道路.....	20
非洲学术侨民：培训和研究.....	23
脱欧后重新定位英国合作伙伴关系.....	26

私立高等教育

中国私立高等教育地位的巩固.....	29
非洲家族式私立高等教育机构.....	31

关注印度

印度棘手的卓越计划	33
印度的省级高等教育政策.....	36
印度高等教育中的教学情况：六项改进原则.....	38
印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艰难的现实.....	40

美国发展

研究生工会化：一个独特的美国问题？	42
美国本科教育的未来	44

高等教育国际化：过去与未来

Jane Knight、Hans de Wit

Jane Knight: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安大略省教育研究所 (the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兼职教授

电子邮箱: jane.knight@utoronto.ca

Hans de Wit 是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主任

电子邮箱: dewitj@bc.edu

在过去 25 年中, 国际化已经从高等教育中的边缘和次要组成部分演化为全球性、战略性的主流因素。作为这种演变的积极参与者和分析师, 我们似乎应该这样问自己: 我们来自哪里? 我们将去往何处?

1995 年, 以部分先前美国和欧洲的研究为基础, 我们共同撰写了题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 历史和概念视角》(*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Historical and Conceptual Perspectives*) 的文章, 作为第一篇针对国际化战略国际比较研究的引入性章节。从那时起, 虽然国际化的含义、缘由和方法已发生变化, 但正如国际化出现的背景一样, 国际化研究的基础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国际化已成为一个非常广泛和多样化的概念, 囊括了在不同和不断变化背景下的许多新的理论基础、方法和策略。观察一下过去五十年中用于描述高等教育国际维度的术语的演变能对我们现在的研究有所启发。

在过去的—个世纪中, 人们重点关注的是留学生奖学金、国际发展项目和区域研究, 谁又曾想到我们今天会讨论新的发展, 包括品牌推广、国际项目和教育提供者的流动性、全球公民身份、本土国际化、慕课、全球排

名、知识外交、世界一流大学、文化同质化、特许经营, 以及联合和双学位课程等议题? 多年来, 国际教育一直是个常用术语, 在许多国家仍受到追捧。

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并不鲜见

重读我们写于 1995 年的文章, 我们震惊地发现, 世界各地当前的反全球化、反移民和内向保守的政治气候在当时已经存在: “孤立主义、种族主义和单一文化主义的危险是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现有关注的威胁。”这一威胁只会变得更加严重, 且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定义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化挑战。在之前的文章中, 我们还提到了克拉克·克尔 (Clark Kerr) 对大学“部分融合”的分析。二十世纪果真如他所言变得更具普适性吗? 看起来似乎如此, 但今天高等教育的国际维度可能已与本土环境脱节了。

国际化的概念比本科生流动更加广泛

在国际化的话语和研究中, 国际学术流动的各种模式——人员、课程、提供者、政策和项目——受到了极大关注, 但对研究生教育和科研国际化的关注还不够, 这包括国际合作发文和其他国际科研基准。近年来,

科研变得更加复杂。它需要比以往更多的国际合作，且这一特点成为当前科研工作的区分性特征，现有的科研项目在性质上愈发具备竞争力。国家和院校迫切需要获得学术人才，围绕诸如专利授予和知识转移等问题的流程比以往需要更多的支持。国际科研资金、专利、出版物和引文的增长需要国际化或全球化科研团队的发展。文献计量分析可以证明科学界的国际合作越来越多。

通过产出和应用科研创造新知识，使国际教育和科研被视为一种“软实力”。“知识就是力量”是一种需要认真反思的发展，因为软实力的特点是竞争力、支配地位和自身利益。权力范式的另一种选择是外交框架。知识外交涉及的是教育和知识的创造、分享及使用对国际关系和参与的贡献。但知识外交应被视为一个互惠的过程。因此，互惠互利和双向交流对于国际教育和科研作为知识外交工具的概念至关重要。简而言之，知识共享和互利是知识外交理解和运作的基础。

国际化真的全面吗？

毫无疑问，国际化已经成熟。它不再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临时性或边缘化的组成部分。大学战略规划、国家政策声明、区域化举措、国际宣言和学术文章都表明国际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核心地位。然而，“全面国际化”这一术语的流行并未反映普遍存在的现实：对世界上大多数院校而言，国际化仍以一系列零散和无关的活动为特征。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日益商品化仍主要是为了达到目标，而非是就潜在风险和道德后果进行辩论。然而，人们越发意识到“国际化”的概念不仅涉及国家间的关系，且涉及文化间的关系以及全球和地方层面的现实关系。

经济和政治理由日益成为与高等教育国

际化有关的国家政策的关键驱动因素，而学术和社会/文化动机的重要性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加。由于我们生活的世界更加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因此必须重新调整并解决这种不平衡。

一些根本性问题

回顾过去 20 年或 30 年间的国际化可能有助于我们提出一些问题。国际高等教育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期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潜力？引导国际高等教育通行于信息和通信革命，人员、思想和技术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文化冲突，以及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时期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从过去学到的哪些东西将指引我们走向未来？对课程国际化、国际和跨文化学习成果以及全球公民身份的强烈呼吁是否被视为对先前的合作与交流的回归，或是为应对当前政治气候和渐增的国际化商业程度的呐喊呢？谁又能预测国际化的转变呢——即从传统上被视为基于合作、伙伴关系、交流、互利和能力建设理念的过程，转变为越来越以竞争、商业化、自身利益和地位建设为特征的过程？

因此，当我们反思与前瞻时，重要的是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支撑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核心原则和价值观是什么？在 10 年或 20 年后，当我们回顾过去时，是否能自豪于国际高等教育为我们所生活的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下一代公民以及生活在贫困中的十亿人口做出的贡献？。

注：本文基于 Douglas Proctor 和 Laura E. Rumbley 编著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未来议程》（*The Future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一书的序言（2018 年由 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

品牌之战：独立的海外“美国”大学

Kyle A. Long

独立研究人员

电子邮箱: longkylea@gmail.com

今年早些时候，伊拉克高等教育部宣布在 2018/19 学年设立一所新的大学。伊拉克美国大学巴格达分校（American University of Iraq - Baghdad）将成为该国第三所“美国”大学。这项最新举措体现了过去 25 年中席卷全球并引起全球反响的趋势：在美国境外建立以“美国”二字命名的高等教育机构，可颁发学士或更高学位。这样的高等教育机构被称为“美国海外大学”（American universities abroad）。在全球范围内，现有超过 55 个国家主办了 80 个此类院校，从尼加拉瓜到尼日利亚再到越南，估计总入学人数超过 15 万人。虽然国外的一些美国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美国内战时期，但过去三十年中所建立的美国大学占比为三分之二。不幸的是，许多这些新兴院校只提供美国高等教育的名号而非内涵。事实上，在海外所有独立的美国大学中，略超过一半的院校似乎名不副实，既未获得、也未在积极申请美国的区域性认证。

质量品牌

人们对中东和其他地方的美国海外大学的兴趣大都可以归结为品牌推广。贝鲁特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的前任校长曾观察到，“美国”一词在教育界就像是“瑞士”一词在钟表界一样有名。由于许多正在私有化的国家对备受关注的“美国”品牌提供有限的法律保护，企业家们发现其

“美国”一词的使用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一些企业家甚至在国外建立了多所美国大学。例如，SerhatAkpınar 在塞浦路斯和摩尔多瓦建立了美国高等教育机构；Alex Lahlou 在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也设立了美国大学；Manmadhan Nair 将“美国”品牌带到了几个加勒比海国家。虽然学者、神职人员和政治家已在海外建立了美国大学，但那些由商业人士建立的院校运行更让人生疑。一家科威特咨询公司的董事长试图在马里博尔（斯洛文尼亚）建立一所“美国大学”，但项目未能成功，因为该镇镇长以大幅低于市场价格的标价出售校园土地而被提出刑事指控。类似的争议也出现在马耳他，总理重新划分了一个受保护的海滩，以说服约旦酒店经营者启动其美国大学项目。

当这些“美国”大学的创始人在国外建立校园时，他们往往无法达到相应的教育质量。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例子是第比利斯的美国人文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for Humanities），该大学在 21 世纪中期被曝光为学位工厂。这一事件导致美国教育部暂停并最终撤销了美国认证机构对其的认证和审核。然而，对于别有用心在海外的美国大学来说，它们更倾向于保持低调以免引起过多注意。“美国”品牌在许多地方都非常有利，它完全不需要经过美国认证机构的审查。无论外部质量保证如何，学生都会继续注册入学。当质量检查有限时，欺骗者会巧妙避开

大学的透明度问题。有些人使用 Facebook 而非学校主页作为其主要通信工具。好奇的研究人员也常遭到这些大学的断然拒绝。

诡计多端的营利院校利用“美国”品牌并采用随意的质量保证制度，他们的崛起对该领域的合法院校构成了挑战，特别是组成美国国际院校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的 28 所院校。2008 年，美国国际院校协会成员院校的校长试图通过签署“开罗宣言”来确定其迅速扩展的全球领域标准，该宣言确认了由独立董事会确保院校自治的中心地位以及经美国区域性认证的质量保证。它还强调了文科课程和非营利性财务模式的重要性，以此区别于那些“名不副实”的院校所提供的业务和技术程序。

其他挑战

在多样性环境中，维持反对欺骗者的统一战线，将它们与真正的大学区分开来，这已经变得相当复杂。该领域包括大型研究型大学，如开罗的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和小型文理学院，如塞萨洛尼基美国学院（the American College of Thessaloniki）等。中等规模的院校在 2000 万美元的运营预算中招收 1 000 到 2 000 名学生，但范围很广。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美国大学（the Arab American University in Palestine）有超过 10 000 名学生，而爱尔兰美国大学（the Irish American University）则只有不到 200 名学生。沙迦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Sharjah）和黎巴嫩美国大学（Lebanese American University）的年度运营费用超过 1.7 亿美元。亚美尼亚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Armenia）和中亚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每年的花费不到 1 000 万美元。渐增的多样性使得找

到共同目标变得越发困难。

该领域的另一个关键挑战是分清院校是否有资格获得美国政府资助。在美国注册并获得认证的几所美国大学正在争取 Title IV 基金并竞争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拨款。早期版本的《高等教育法案》（the Higher Education Act）包括一项有利的修正案，但立法已停滞不前。一些美国海外大学已获得联邦资助，主要是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及其海外美国学校和医院。但总体而言，美国国际院校协会成员院校的运营预算中只有 4% 来自美国政府。

威权主义的全球崛起为美国海外大学带来了又一个挑战。匈牙利政府最近对属于美国国际院校协会成员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的镇压就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虽然中欧大学似乎准备忍受打击，但其他院校却无法在这种出于政治动机的攻击中幸存下来。阿塞拜疆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Azerbaijan）于 2000 年关闭，缅甸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Myanmar）于今年早些时候关闭。基辅的政治压力阻止了乌克兰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Ukraine）的起步。对阿富汗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Afghanistan）的反复攻击则表明：即使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的院校也无法免受政治极端主义的迫害。

展望未来

未来几年，资金和声誉问题可能在该领域占据上风。虽然到目前为止援助水平基本保持不变，但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义和“美国至上”的外交政策可能会最终导致美国海外大学进一步的资金削减，从而增加了获得《高等教育法案》资格的利害关系。与此同时，在国外建立“盗版”美国大学肯定会继

续快速发展，特别是在管理宽松的低收入国家。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国际院校协会在抵御品牌降级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其成员院校的领导者还在继续讨论保持“美国”名称完整性的策略。美国国际院校协会近年来

考虑的选项包括开发认证和/或排名功能。它也可能被美国财政部（the US Treasury）认可为标准制定组织。如果美国国际院校协会能够整合集体意志，那么以上这些变化可能会很快发生。

跨国高等教育的定义

Stephen Wilkins

阿联酋迪拜英国大学 (The British University in Dubai) 管理学副教授

电子邮箱: stephen.wilkins@buid.ac.ae

跨国高等教育涉及跨越国界的教育提供者和课程。教育提供者以各种形式呈现, 如不同的所有权结构、目标、策略、学科和学生类型。本文的目的是确定不同类型的跨国教育提供者, 以便对这些机构进行分类和定义。本文的重点仅放在机构流动性上, 因此课程流动性, 如远程教育、特许经营课程以及联合或双学位项目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

在《国际高等教育》(2018 年春季第 93 期) 中, Wilkins 和 Rumbley 更新了对国际分校的定义: “国际分校是一个实体, 至少部分由特定的外国高等教育机构所有, 该院校对分校的整体战略和质量保证负有一定的责任。分校以外国院校的名义运作, 提供带有外国院校名称的项目和/或证书。该分校拥有基本的基础设施, 如图书馆、开放式计算机实验室和餐饮设施, 总体而言, 该分校的学生与主校区的学生有着相似的学生体验。”

迄今为止, “国际分校”这一术语已适用于大多数跨国教育活动, 涉及在外国院校拥有的场所进行教学, 其中学生的上课地点和所获奖励具有外国院校的名称。但是, 上述定义实际上并不适用于大多数跨国教育提供者或是能与之相适应。

教学场所

绝大多数跨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注册学生不到 1 000 人。因此, 这些机构不具备一个

校园所需的规模, 包括提供教室、计算机实验室、图书馆、餐饮设施、体育和休闲设施的土地和场所, 以及教学和行政人员办公室。相反, 大多数跨国教育机构在办公大楼的几个房间中运行, 其中, 许多机构只提供一种或几种教育资格证书, 而其他机构在主办国所雇佣的全职教师数量很少或是几乎没有。

不具备国际分校规模的跨国机构可被称为国际学习中心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er): “国际学习中心是一个实体, 至少部分由一所特定的外国高等教育院校所拥有, 该院校对该中心的整体战略和质量保证负有某种程度的责任。该中心以外国院校的名义运营, 提供带有外国院校名称的课程和/或证书。这是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项目, 学生人数不足 1 000 人。该中心可能只提供一门学科或课程, 且其全职教师数量可能很少或是根本没有。”

学生

国际分校和国际学习中心通常在其所在国招收大部分的学生。这些学生可能是主办国的公民或侨民。一些机构也成功地招募了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学生。然而, 一些跨国机构不为主办国或邻国的学生提供教育, 而是为在主校校园的学生提供留学体验。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 一些美国大学建立了海外学习中心, 从那时起, 其他国家的大学也开设了类似的中心。这些中心的共同目标是提高学生的外语能力; 促进特

定学科的“实地”研究；并为学生提供对不同文化的接触和体验，这些可能会激发学生的全球思维，最终促进世界和平。

主要为母校学生提供出国留学经历的跨国机构可称为国际留学中心（international study abroad center）：“国际留学中心是一个由特定的外国高等教育机构所拥有的实体，其目的通常是为该院校的学生提供海外留学经历。该中心以外国院校的名义运营，提供带有外国院校名称的课程和/或证书。通常，学生在留学中心度过相对较短的时间（如一个学期），且大多数学生可获得学分。”

所有者

近年来，总部设在不同国家的大学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建立具有自己法律地位的新院校，且通常包括合作机构双方的名称（例如，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或西交利物浦大学）或是完全不包括合作机构名称（例如，联合国际学院[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这是北京师范大学（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和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间的合作产物）。这类伙伴关系在顶尖的、排名靠前的高校中尤其受欢迎。

由两所大学共同拥有的跨国机构，双方都有制定重大战略决策以及共担利润或损失的责任，可以被称为国际联营机构（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 institution）：“国际联营机构是一所高等教育机构，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国家的院校共同拥有。每所合作院校对共同所有实体的整体战略和质量保证负有一定的责任，两家主办院校分担联营机构的利润和损失。”

高等教育中始终存在国际协作与合作。如今，有许多有关独立大学与外国高等教育体系相关联的案例，并且这些大学依赖外国院校所提供的建议、课程、资源和质量保证。

这些独立院校包括阿联酋的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the Emirates），越南—德国大学（the Vietnamese-German University）和迪拜的英国大学（the British University in Dubai）。迪拜的英国大学与四所英国顶尖大学（卡迪夫大学、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每所大学都就课程设计、项目交付、科研活动和质量保证等相关事宜为迪拜英国大学提供咨询或合作。

遵循外方高等教育体系且隶属于至少一所外国院校的独立机构可被称为外方支持机构（foreign-backed institution）：“外方支持机构是独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它遵循外方高等教育体系，且至少隶属于至少一所与之协作或合作的外国院校，并从中获得建议、服务和/或资源。”

遵循外国高等教育体系但不隶属于外国院校的独立机构（例如贝鲁特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和开罗的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不是外方支持机构，因为没有相关的课程、工作人员或资源的跨国转移。

结语

跨国高等教育以各种形式和模式运行。本文确定了最常见的跨国教育提供者类型，并为每种类型提供了可能的定义。本文所提供的跨国机构分类对于科研人员 and 那些发布跨国教育数据的人来说有所帮助，但需要承认的是，在实践中，参与跨国教育的机构本身就使用各种术语来指代其运行模式。例如，主办院校将其国际分校简称为全球校园的做法相当普遍，同时也强调海外校园不是分支机构。这些行为或许是对此前学术殖民主义指责的回应，但国际分校通常是在主办国政府和监管机构的批准和鼓励下建立的。

引入国际分校助力埃及高等教育发展

Jason E. Lane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教育政策与领导力主席兼副教授、跨境教育研究小组 (Cross-Border Education Research Team) 联合主任

电子邮箱: jlane@albany.edu

埃及在开罗郊区的沙漠中建立了一个“新开罗”，这是一个政府和商业中心，政府希望国际分校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在提高经济竞争力和全球声誉的推动下，各国政府越发将国际化视为推进国家政策优先事项的手段。政府对国际化的关注可能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举措，但也可能会带来令人不安的政策性和操作性影响。

埃及不是第一个宣布将引入国际分校作为国家战略组成部分的国家。中国和卡塔尔也是如此，但方法各不相同。一些国家提供大量补助；其他国家则采取更具自由市场特征的方式。共同点在于利用“国际化”来引进海外学术投资，以构建当地的教育能力。这虽然带来了一些好处，但这些努力也引发了有关海外分校可持续性和潜在权衡问题。

埃及的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主要体现在激增的学生流动上。2017 年，约有 4.7 万名外国大学生在埃及注册，较之于 2010 年的不到 2 000 人有了大幅增加。由于公立院校向非本国公民开放，因此，埃及成为中东学生流动的主要中心，但在大多数阿拉伯海湾国家情况并非如此。相对于许多其他地区的院校而言，埃及大学学费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国际分校现被视为扩大国家国际化利益的机会。引入国际分校的努力也反映了埃及政府看似矛盾的立场，即接受外国投资并建立国际关系以作为加强国家在全球舞台作用的手段，同时似乎也遏制了对其引入的国际分校至关重要的本土自由。

埃及的高等教育

埃及有 24 所公立大学和 23 所私立大学，包括开罗美国大学 (1919 年) 和柏林技术大学 (the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erlin) 于 2012 年开设的国际分校。埃及高等教育入学人数从 2010 年的约 200 万学生增加到 2017 年的近 280 万人。

最近的政府政策为高等教育制定了新的议程。其中包括：到 2030 年将大学生人数增加近 50%；通过新的认证程序提高教育质量；要求新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与排名靠前的海外院校合作；通过增加全球 500 强大学的数量来提高国际竞争力；将国际学生人数增加 50%；更好地使教育产品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保持一致等。

平衡国家权威和院校自治

不断增长的学生需求和新的政策环境可能会吸引潜在的国际合作伙伴。不过，细节非常重要。关于国际分校的新法律旨在平衡国家监督和学术独立需求下的国家参与。

哪些国际分校将获得运营许可仍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获批的院校将在推进其使命上获得高度的灵活性。目的是提高埃及的国际教育形象，吸引全球学生。并且，国际分校必须接纳一定比例的埃及学生。国际分校被授予行政自治权；且必须聘请一些埃及教职员工。埃及政府将提供设施和一些持续的

行政支持；政府将对学费收取不超过1%的税收，以覆盖其投入。法律规定：国际分校不受政府的学术干涉；然而，当周围环境没有相同的自由度时，大学的模糊边界会使得自由运行难以操作。更进一步的细节尚未确定；但是，政府的积极参与有着明显的意义。

此外，埃及的政策环境就像沙漠中的流沙。随着国际分校成为现实，现在看起来合理的权衡可能会进一步发展。这种演变似乎很难预测。

埃及对国际分校的兴趣：信号传递、外交和跨越式发展

投资教育的理由已经明确。为何一国追逐海外大学，而非投资于国内部门，或是在两方面同时投资呢？背后的原因尚不清楚。埃及高等教育部长最近的一份声明提供了一些信息：“英国大学在埃及建立国际分校的机会将支持埃及的国际化雄心和劳动力市场需求……国际分校将为埃及的高等教育格局做出贡献，促进英国和埃及在科研、创新和流动性方面建立更为广泛的国际伙伴关系。”

招募一所著名的外国大学开设分校标志着一些有趣的（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在承办国，这值得外界参与者的关注。对国内教育系统的类似投资可能不会传递出相同的信号，或者至少不会那么引人注目。一个国家建立新的首都可以得到外界关注；而拥有著名的国际分校，特别是来自全球大国的国际分校则进一步吸引了人们了注意力。国际分校可以成为加强地缘政治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吸收其他形式投资的基础。国际分校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新形式的公共外交，它在两个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种物理和文化联系。埃及政府的希望国际分校可以成为进一步合作伙伴关系的催化剂。

招募成熟大学的国际分校可以成为进口

外国学术资本的机制，以帮助发展当地教育体系。在许多方面，这种学术投资（与海外直接投资业务相当）可以成为推动教育跨越式发展的一种手段，但如果只投资国内院校的话，教育发展的速度就没那么快。因此，国际分校可以加速埃及成为数所顶尖大学中心的进程。

国际分校需要考虑的几点影响

支持者认为，新开罗是埃及未来的重要象征，也是新进投资的灯塔。批评人士则表示担忧，他们认为将富裕的社会成员迁移到新的城市并将国际分校集中在新开罗将加剧社会阶层的不公平现象。

埃及也具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政策和政治环境。今天创建的政策明天就可以撤消。引入海外分校可以提升能力、调整结构以与经济举措保持一致，并作为提高全球排名和招纳国际学生的手段。然而，主校的成功在于批判性研究和自由表达的学术风格，分校承办国则在更广泛的环境中削减这些自由，在这种冲突的环境中会发生什么呢？

在其他地方设立国际分校的大学选择在类似环境中运作时做出了妥协，它们通常认为从内部帮助改变社会比从外部改变社会更加容易。实际上，国际分校可以是知识和示范点的“大使馆”，在这里，学术自由可以免受外部环境中的约束得以发展。但是，这些活动必须小心谨慎，且往往对个人和院校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在一个动态的政策环境中，即允许对互联网的某些部分实行不受限制的禁令，以及对外国企业的态度可以迅速从受欢迎到被禁止的情况下，这种风险会变得更高。精英机构是否愿意冒险进入埃及动态的政策环境之中还很难说；这可能取决于其自我判断，即收益是否高于风险。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国大学的海外分校

郭洁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国际办公室主任、讲师，自 2012 年起参与马来西亚厦门大学的创办

电子邮箱：410125299@qq.com

凭借典型的中国速度，厦门大学的第四个同时也是最新的校园已完成了第一个开发阶段，该校园距离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约 45 公里。该项目最初于制定于 2012 年，开始于 2014 年，并于 2017 年 11 月进入其第二阶段。在马来西亚的十所国际分校校园中，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Xiamen University Malaysia）面积最大，为 47 万平方米，是最大的整体投资（约 15 亿令吉，超过 3700 万美元，大部分资金来自厦门大学），并为厦门大学所有。分校于 2016 年 2 月 22 日开始运营，目前开设了 15 个项目，招收了约 1 720 名马来西亚学生，950 名中国学生和 30 名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学生。预计五年后，学生总数将达到 5 000 人。

马来西亚的国际教育、商业化及竞争

在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成立之前，马来西亚政府邀请了三所澳大利亚和六所英国大学在马来西亚各州建立分校。这些举措基于一项名为“亚洲国际教育基地”（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ase of Asia）的战略计划，该计划始于 1990 年左右。20 世纪 90 年代是马来西亚经济开始寻找新的发展途径而非出售传统自然资源的时代。多年来，马来西亚不断增加的国际学生数量证明了该计划在全球教育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呈现有效性。特别是，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招收优秀的国际学生；入读的中国学生是“高

考一本生”（即中国国家高考中的顶尖学生）。据当地教育专家介绍，这是马来西亚在历史上第一次吸引了来自中国的一本生，中国的海外学习项目过去只关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西方国家。

马来西亚的战略计划为马来西亚和大多数参与该计划的国际大学带来了互惠互利，因其促进了教育的商业化，并刺激了大学之间的激烈竞争。依据马来西亚政府的要求，国际分校校园是私立大学，学费高昂且不断上涨（通常为每年 4.2 至 4.8 万令吉）。当地的私立大学，大多是由华裔马来西亚人开设的，收费是国际分校的一半到三分之二，但却没有一所当地私立大学进入世界排名。马来西亚公立大学学费较低，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更高的就业能力，但该系统优先录取马来西亚本地学生，对其他国籍学生的录取有限定配额。这种不均衡的配额制度引发了私立大学的兴衰蜕变。相比之下，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每年收取 2.2 至 2.4 万令吉的学费，它公开承诺不会将资金用于任何商业用途或返还给位于中国的主校，而是将其所有收益用于当地的学术研究和学生奖学金。

收取较低学费也存在问题，因为从统计数据来看，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需要 30 年才能实现收支平衡。因此，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在财务可持续性和非商业精神之间的平衡上受到质疑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当地招聘的专业人员也对此感到担忧——厦门大学

马来西亚分校是否能长期保持稳定的收入来源并保留合格的人才。在一、二十年前成立的、相对成熟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分校可能会成为未来人才招聘和招生方面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最后,在没有任何其他股东的情况下,主校的所有权意味着声誉,但也意味着压力。幸运的是,跟随爱国华侨、马来西亚华裔大亨、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先生的步伐,华裔马来西亚人自2013年以来就一直向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捐款。

东盟与中国的教育共识

“博洛尼亚进程”深刻影响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和中国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其欧洲学分转移制度(ECTS)。2007年,东盟国家就学位和学分认可达成了共识。2016年,随着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东盟和中国同意扩大早先的协议,以促进高等教育和文化交流。马来西亚拥有十个国际分校,在学术和文化交流方面是东盟地区的领导者之一。

一个成功的模型是可复制的,东南亚的其他国家正试图效仿马来西亚的方法。自2007年以来,老挝万象已授权苏州大学(中国)在老挝开展运行。2016年,泰国邀请云南财经大学(中国)与泰国Rangsit大学一起创办曼谷商学院。2013年,在全球化和中国参与更广泛地区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发布了“一带一路”倡议。从那时起,中国的大学一直在海外积极开展业务,包括招收国际学生到中国学习,特别是东盟学生。然而,欧

盟的模式很难复制,因为学生交流和招募的相互协议尚未建立在东盟内部政府层面的共识上;例如,所有东盟国家都决定继续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参与过程对参与国有益但却不是强制性的。

因此,第一个中国海外分校被称为“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的友谊桥梁”。据当地招生机构介绍,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适合华裔马来西亚人的教育市场,但其未来的运作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间的关系。紧张局势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之间的沟通被切断。在马来西亚61所独立的中国学校中的华裔马来西亚学生直接受到政府间关系中断的影响,他们参加了“马来西亚独立中学考试”(Malaysian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Examination),但从1957年开始,马来西亚公立大学不再录取从这些院校毕业的学生,这项禁令至今仍在继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政府重新调整了国家政策,从保护马来人的利益转向适应更加多元化的民族和多元文化现实。法律框架现在保护华裔马来西亚人,但大多数接受国家考试的华裔马来西亚学生并没有被公立大学大量录取,因为公立大学的入学配额保持不变。

总之,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建立过程反映了马来西亚、东盟和中国近期教育发展的结合。尽管分校校园取得了成功,但亚洲全球化教育市场的扩张将意味着未来的激烈竞争。对此,大学已做好了充分准备。

忘记竞争的比喻吧

CresoM.Sá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安大略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教授、加拿大及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c.sa@utoronto.ca

在民粹主义抬头之前, 高等教育国际化就已在衰退, 相关辩论中最常见的比喻之一就是国际学生的全球竞争。支持吸引国际学生的方面包括了各种奖学金计划和国际学生招生计划, 这些计划多年来一直存有完整的记录。学术和政策文献都强调这种竞争的跨国规模, 并将其定位为经济成功的关键。因此, 人们认为政府通过招收更多海外学生进入本国高等教育机构从而赢得全球竞赛。

这种情况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政府之间相互竞争, 就像他们在贸易和国际事务等领域一样, 那么, 我们期望在政府的行动中看到某种长期模式。这就是多伦多大学博士生 Emma Sabzalieva 和我想要弄清楚的问题: 英语文化圈主要的接收国是否真的参与了一场吸引最优秀国际学生的全球竞赛?

我们研究了 2000~2016 年期间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公共政策是如何处理高等教育中国际学生的问题。我们还研究了影响这些学生的政策框架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这四个国家在 2015 年招收了约全球 40% 的国际学生。针对每个国家, 我们进行了一个案例研究, 追踪调查期间相关政策的变化, 并确定了与政策变化相关的事件。我们解释了立法的通过、新计划的引入以及针对每个国家政治背景的相关政策变化。在我们最近发表在《高等教育》期刊 (*Higher Education*) 中的论文《人才竞争中的政治学:

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公共政策与国际学生招生》(*The politics of the great brain race: public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 recruitment in Australia, Canada, England and the USA*) 中, 我们认为这些国家在吸引和保留国际学生上的做法相互脱节。此外, 针对全球学生竞争所需的长期规划显然并不存在。

不相协调的做法

我们的分析表明, 这四个国家的国际学生入学率的长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政策发展脱节。虽偶尔出现波动, 但在 2000~2016 年期间, 四个国家的国际学生入学人数稳步增加, 且增幅巨大: 加拿大增加了 226%, 澳大利亚增加了 110%, 英国增加了 81%, 美国增加了 48%。

对几个相关部门政策的观察带来了不同的信息, 这些部门影响了国际学生入读当地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可能留在这四个国家的机会/能力。尽管共同的政策言论促使人们保持全球竞争力和吸引人才, 但却没有一个国家保持一贯的方式来促进国际学生的招生或留用, 也没有寻求改进其政策和法规。

例如, 在移民方面, 针对国际学生的限制已在不同时期被收紧, 且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政府开始之前政策就已收紧。例如, 在 21 世纪早期, 英格兰改变积分移民系统来限

制国际学生，同时限制学生签证的时限、工作权利以及他们可以入读的课程数量。同样，加拿大于 2015 年引入快速入境筛选系统，旨在简化签证申请流程并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整合，使国际学生在寻求永久居留权上面临更多的竞争。在这两种情况下，当权政府都声称要争抢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但同时又使国际学生难以维持生活或成为当地永久居民。

显而易见的是，在医疗保健、就业准则、家属规定、经济援助、学费和税收等一系列政策，没有一个国家表现出促进国际学生流动的模式。这些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公共政策影响着国际学生且跨越政府机构或政府部门。将政策与单一部门隔离忽视了管理与国际学生相关问题所面临的复杂性。因此，国家需要在政府和高等教育部门之间进行协调，以解决对国际学生的限制。英格兰最近的“首相倡议”(the Prime Minister's Initiative)

和澳大利亚最近的国际教育战略是寻求跨部门解决方案政策举措的良好示例。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领域的政策协调仍难以实现。

结语

如果主要英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有意参与招收国际学生的全球竞赛，那么人们就会期望在某个领域看到政策变化。这是在某个行业竞争中每个国家所应该做的：采取果断行动以最大化一国的比较优势。实际上，在本世纪的前 16 年中，有关国际学生招生和保留的政策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虽然政府使用的话语可能有相似之处，它们都一致支持大学在全球范围内招收学生的雄心壮志；但是可以看到：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国家的政策行动遵循不同的逻辑。因此，四国国际学生数量的增长并不是政治环境和政策变化带来的结果。

衡量全球排名中的教育质量：可能性之谈

Philip G. Altbach、Ellen Hazelkorn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科研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Ellen Hazelkorn: 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学院 (Dub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部荣誉教授、主任、BH Associates 合伙人、教育顾问

电子邮箱: ellen.hazelkorn@dit.ie

最有影响力的全球学术排名——“上海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 简称 ARWU 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简称 THE 排名)和“QS 顶尖大学排名”(QS Top University Rankings), 已经存在了十多年, 现已成为塑造全球高等教育的主要力量。排名机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根据自己的标准呈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但是, 这些排名只对全球超过 2.5 万所学术机构中不到 5% 的院校进行排名。排名的影响力巨大, 学生据此决定学习目的地; 一些政府据此分配资金; 大学也努力提高自己在排名中的地位。

从一开始, 这些排名主要集中在科研生产力上。但 QS 和 THE 排名中也有声誉评价指标, 但这些指标仍存在争议, 因为较低的问卷回复率带来了结果上的偏差和不准确性。每个调查指标都是独立考虑的, 其中多重共线性更具说服力——换句话说, 博士生、引文、科研收入、国际化等指标高度相互依赖。考虑到一些指标上的重叠, 科研相关指标约占 QS 总分的 70%, 而声誉则占 50%。ARWU 和 THE 排名都是 100% 基于科研/科研相关指标。

教学进入排名视野

毫无疑问, 教学是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的基本使命; 除少数例外, 本科生占全球高等教育总入学人数的绝大部分。然而, “世界一流”的概念来自那些在全球排名中得分最高的大学。这解释起来相对容易。因为文献计量数据很容易获得, 所以, 研究密集型大学往往是国际上最知名的大学, 也因此声誉评估中最为知名, 但这种做法忽视了艺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以及区域性或国家性研究——特别是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发表的科研成果。

通过纳入更多关于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指标, 全球排名很快就能够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Richard Holmes 指出, 这仍然是“未开发的领域”。然而, 这个问题比选择指标更为根本。教学和学习没有被纳入全球排名的一个原因是很难在不同国家、院校和学生中进行衡量和比较。此外, 排名机构有必要考虑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内容, 以及学生如何随学习经历而改变, 而不只是反映学生之前的经历, 即他们的社会资本。需要关注的是学习环境的质量和 Learning Outcomes 而不是院校的地位或声誉。因此, 许多个别的院校都试图通过

各种措施来评估教学质量，包括教学档案和同行评估，以此招聘和晋升教师。在许多国家，教师必须在就职之前或之后获得教学实践证书。更重要的是，人们认为我们可以使用与衡量学习成果截然不同的方式大规模衡量教学，这显然是错误的。教学质量作为一种院校属性的概念也存在问题，因为研究表明，大多数差异发生在院校内部，而非院校之间。

衡量教育质量和学生学习

关于教育质量的争论在每个国家形式不一，但是各国越来越重视学习成果、毕业生品质、生活技能等因素，尤其重视高等教育机构对学生学习的贡献。

2011年，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简称PISA）取得成功后，经合组织试行了“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Assess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 简称AHELO）项目。通过对17个国家的学生进行共同测试以确定和衡量良好的教学和学习。AHELO的开发是为了挑战主要的基于科研产出的全球排名的主导地位，但AHELO被证明存在争议且被暂停。另一个排名替代方案——“经合组织成人能力国际评估项目”（the OECD 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 简称PIAAC）衡量成人在拥有各种技术手段的环境中的识字、算术和解决问题的熟练程度，PIAAC的结果首次于2013年发布。

一些国家正在制定教学质量评估标准。2016年，英格兰率先推出了“教学卓越框架”（the 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最初的政府提议存在争议，尤其是因为结果与资

金挂钩。教学卓越框架由主要利益相关者联盟开发，用于评估本科生的学习，并将从2020年开始扩展到对学科水平的评估。全国性测评则是另一种方法，巴西的“全国学生表现测评”（Exame Nacional de Desempenho de Estudantes）评估学生在各个专业领域的能力。该测试旨在评估大学课程，而不是学生本身或学术知识。同样，哥伦比亚已开发出具有类似目标的SabrePro测试。在美国，“大学学术水平评估”（the Collegiate Assessment of Academic Proficiency）、“大学学习评估”（the 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和“ETS能力透视测试”（the ETS Proficiency Profile）旨在使用国家考试来衡量学生学习。还有学生自报数据的各类调查，例如“全国学生参与调查”（the 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简称NSSE），以及“社区学院部门的社区学院学生参与调查”（the Community College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NSSE评估学生投入学习和其他教育相关活动的时间和精力，以及机构如何部署其资源和组织课程。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爱尔兰、新西兰和南非等国复制了NSSE计划，日本、韩国和墨西哥也有类似举措。

全球排名在做什么

所有全球排名，包括欧盟的“多维全球大学排名”（U-Multirank）在内，都囊括有关教育质量的指标，有些指标比其他指标更成功。QS、THE和U-Multirank（后者在学科层面）都使用师生比。然而，由于教师和学生不同学科、院校和国家间进行分类的方法不同，所以在衡量教育质量上，这是极不可靠的指标。QS和THE都包括对教学的同行调查，但尚不清楚基于什么基础，任何人

都可以在不在教室的情况下评估别人的教学。ARWU 使用授予校友和教师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作为教育质量的体现——这显然有些欠妥。

THE 凭借华尔街日报/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的经验，刚刚推出了“欧洲教学质量排名”（Teaching Quality Ranking for Europe）。该排名的 50% 基于华尔街日报/泰晤士高等教育学生调查，另 10% 基于学术声誉调查。它还将最终得分的 7.5% 分配给发表的论文数量，将 7.5% 的分配给师生比。学生调查似乎是从美国 NSSE 调查中得出的，但在国际比较基础上使用此类调查存在很大争议，因为没有确保代表性样本和会计学生之间的差异以及自报数据的缺点。THE 也使用女性学生比例（10%）作为包容性的衡量标准，但这也存有疑问；因为截至 2015 年，女性学生占欧盟 28 所大学生的 54.1%。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基本的测量指标与实际教学有关——即便对“教学”这一概念的定义很多。

结语

尽管对全球排名方法的方法论和实践方

面持怀疑态度，但竞争无处不在。排名组织、政府和科研人员采取各种行动，以确定更合适的方式、使用更可靠的数据，以衡量和比较教育成果、毕业生就业能力，大学与社会参与等。在学生、毕业生以及专业人士不断流动的全球化世界中，我们需要更好的信息来评估个人能力。

但排名的一个教训是，如不够谨慎的话，排名指标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我们知道学生的学习成果将决定其未来的机会。但是，如果大学变得更有选择性且专注于最有可能成功的学生以提高他们在全球排名中的地位，那么基于简单化方法的结论可能会进一步使那些能够并且应该受益最多的学生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对教育成果进行可靠的国际比较极具挑战性。显然，评估教学和学习对于确定高等教育质量至关重要，但使用现有方法来制作可比较数据似乎有些牵强。我们不应该通过相信排名提供有意义的教育质量评测来欺骗自己，而应承认部分排名只是为了商业利益而使用不具说服力的指标。或者，现在至少可以承认的是，我们不可能充分评估教育质量以进行国际比较。

世界一流大学与共同利益

田琳、吴燕、刘念才

田琳：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lintian@sjtu.edu.cn

吴燕：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电子邮箱：wuyan@sjtu.edu.cn

刘念才：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电子邮箱：ncliu@sjtu.edu.cn

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终身学习的强化以及高等教育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趋势都促成了全球高等教育格局的不断变化。在此背景下，曾经主导高等教育领域的“公共利益”一词现正受到质疑。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题为《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的报告，提出“共同利益”这一理念可以作为“公共利益”的建设性替代方案（后者传统上被认为与教育及其产出密切相关），“共同利益”带有“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和“共享参与”（sharing participation）的特征（UNESCO, 2015）。本文探讨了世界一流大学与新提出的全球共同利益概念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作为一个网络或团体，世界一流大学是一种全球共益物品（global common good），并能创造和推动全球共同利益，不仅有利于学生的个体发展，也能造福于更广泛的全球社会。

高等教育理念的转变：从“公益”到“共益”

许多学者都认识到了高等教育和大学的“公共性”，包括创造和传播知识、提高受教育者的生活质量、为企业提供创新支持、为

民主决策提供支撑等。但是，大学的“公共性”正在受到挑战。

有人认为，高等教育渐增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高等教育的“公共”特征，模糊了“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限。此外，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在教育过程中更加强调“共同”而非“公共”。根据UNESCO的报告，“共益”学习鼓励人们在学习过程中积极主动，通过各种渠道共同努力，从而为学习过程中所有参与者带来益处，并改变从被动地接受“教育”到主动“学习”的过程。“公益”教育通常由政府义务提供，受教育者无需付费即可获得教育机会，因而这很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在某些情况下，接受教育可能会成为一个被动的过程，人们认为获得“公益性”的教育机会是理所当然的，因而在此过程中无需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因此，就高等教育理念而言，从“公共利益”转向“共同利益”的好处显而易见。这意味着我们对教育的关注变成了教育的“结果”（实现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而非教育的“提供方式”（由公立机构还是私立机构提供）。此外，在一定程度上，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共同利益的观点还让多元化的教育提供者

和经费来源成为可能。这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带来更多的教育资源。此外，当我们谈及当前对主动学习和终身学习的需求时，共同利益的概念显然弥补了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不足。因为“公益物品”不会将付出（个人通过何种方式获得公益物品）与使用（个体享用公益物品）联系起来：公益物品容易导致搭便车行为，而共益物品则体现了所有参与者的集体努力。参与者及其所参与活动的益处是通过共同行动产生的；此外，不论年龄大小，人们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学习，推动了终身学习的现实。

“共益”视角下世界一流大学的角色

在实践中，高等教育通过培养人才、推动研究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共同利益做出贡献。我们处于一个新的环境之中，伴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化、新的信息技术、环境问题以及英国脱欧等引人注目的政策变革，这为全世界的高等教育机构带来了机遇和挑战。除了寻求自我发展的机会外，世界一流大学（也即全球顶尖的精英型大学）需要将自己定位于寻找全球性问题解决方案的最前沿，以应对我们所处时代面临的紧迫挑战，从而造福全人类。

人们普遍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由全球顶尖的公立和私立大学组成，聘用最合格的教师并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最优秀的学生；这些大学关注于国际环境，并不断根据外部世界调整自己；它们致力于解决具有全球挑战性的全球问题，并积极与其他组织寻求合作。在这一点上，世界一流大学已超越了“公共”和“私人”的概念，发挥着全球共益物品的作用，重视全球发展和相互联系，也关注全球社会的福祉。

这在世界一流大学的三大功能中有所体

现，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在分析了 2016 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中被公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前 20 所大学的使命和愿景报告之后，与其三个功能相关的主要关键词可概括为：

- 人才培养：国际/全球的；世界一流的/优异的/最佳的；科研为主导的/科研为基础的；专业的；有创新/创意的；多样的；鼓舞人心的；跨学科；包容/开放/自由的。

- 科学研究：卓越的/世界一流的/最高水平的；国际/全球/世界性的；合作/合作伙伴关系；新的/尖端的/原创的；知识；跨学科的；具有挑战性的/困难的。

- 社会服务：社会；全球/国际/全球性地；社区；民族/国家；合作/协作/合作伙伴/互动；参与；挑战/有挑战性的；优异的/重要的；人类；生活/福利/福祉。

在人才培养方面，世界一流大学正努力建立一个由最杰出人才组成的人力资本库，以成为最重要的国家和全球资源。在科学研究方面，世界一流大学开展最先进的科研项目，发现最先进的知识，解决国际关注的挑战性问题，以提升人类福祉。在社会服务方面，世界一流大学旨在应对最为复杂和最困难的全球挑战，造福人类社会，并以变革的方式影响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为全人类和全世界的可持续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结语

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顶尖研究型大学，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构成了一种全球共益物品，而且还创造了诸如先进知识和卓越科研等全球共益物品，从而有助于所有实现全人类共享的利益（如和平发展）。因此，世界一流大学是非常重要的全球共益物品。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一流大学无所不能。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是一个愿景,也是一种展望,它引导世界一流大学为社会提供一流的教育、科研和广泛的服务;与此同时,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并促进全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注:本文改编自2017年发表于《世界大学新

闻》的《高等教育“共益”理念的转变》(*A shift to the global common good in higher education*)一文;也基于世界一流大学中心WCU-7会议论文集集中的《世界一流大学:“共益”视角下的双重身份》(*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 double identity related to global common good(s)*)一文。

给予难民高等教育机会：为融合铺平道路

Bernhard Streitwieser、Lisa Unangst

Bernhard Streitwieser: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国际教育助理教授

电子邮箱: streitwieser@gwu.edu

Lisa Unangst: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博士生、研究助理

电子邮箱: unangstl@bc.edu

在过去几年中，为难民提供高等教育机会一直是德国的一个重要议题，这同时也是大学为所有学生（不仅是难民）提供更多服务的机会。有关大学行政程序的定性研究，包括通过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the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的“融合” (Integra) 和“欢迎” (Welcome) 项目提供的支持结构，反映了难民学生面临的共同障碍，包括学习德语、通过大学预备课程（范围和持续时间各不相同）、通过资质评估和主题能力测试等。这些学生还与所有非欧盟国际学生竞争入学，后者可能有多年的德语培训经历并相当熟悉德国文化。最后，也许是最困难的事情在于，难民还必须克服社会情感创伤、庇护所的不确定性，以及一些群体对他们在该国生存的强烈抵制等问题。

在过去几年中，政府、研究所、基金会和科研人员进行了大量的德国和国际大规模研究，这些研究为理解难民在高等教育环境中的融合过程和挑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其中，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提供的服务和分析工作脱颖而出。作为难民援助的主要资助者，以及致力于难民问题研究（为促进难民和移民融合提供教育途径）的大学召集者，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具有独特的双重身份，其独特定位在这一问题上引起了人们的

关注。

德国高等教育机构中难民的融合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最新报告——《德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的难民融入》 (the *integration of refugees at Germa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具有重要意义。原因有两个：首先，它对难民学生正获得的大规模进展“提出了[新的]基于证据的研究结果”。其次，它提供了“密切监测的重要基础”，针对的是大学将 1 亿欧元用于支持衔接课程和其他倡议中的难民学生，而这是问责制的关键。这些数据对于打击德国右翼党派德意志民主党 (th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等政治上反对派对难民援助的批评至关重要。

在其研究中，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概述了一系列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问题不仅适用于德国，且在努力支持难民群体的其他国际环境中也相当有用。报告中的几点论述也涉及具有移民背景的学生。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重点介绍该报告的一些最为重要的观点，以及它们与目前吸收难民和高危移民的教育系统所面临的更广泛共同挑战的关系。

处理书面文件

尽管德国高等教育部门对大多数学生提

供免学费教育（仅有两个州针对欧盟以外的国际学生收取学费），但填写复杂的书面表格及文件以获得进入大学被认为是难民学生获得奖学金的负担。例如，美国已针对类似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即联邦学生援助免学费申请（the Free Application for Federal Student Aid）如何为许多学生（包括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且英语不是第一语言的学生）带来障碍。无论是在强制性定向课程的支持下，还是作为已实施的衔接课程的必要组成部分，为学生提供有关大学申请程序的咨询至关重要，更何况这些程序有时还带有点官僚主义色彩。

从学校到社区

此外，学生与就业中心和其他社会服务机构的协调也被存在问题。难民学生必然要参与各种社会服务，但在德国，大学可能无法解决学生的需求。例如，正如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所建议的那样，大学校园的中心办公室可以为学生提供有关补贴住房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现场咨询和信息。或者，每个大学城或城市可以指定一位联络人作为带有需求的学生的首个联络点。

认证障碍和难民护照

尽管在这方面的进展引人瞩目，但学生本国的证书认证和学分的认可事宜仍值得关注。事实上，所谓的“难民护照”将于 2018~2020 年在九个欧洲国家进行试点，并对学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验和语言能力等信息进行整理和核对。虽然这一文件可能最终能解决部分学分转移问题，但仍需要采取和加强调解性措施。无论他们是难民还是移民，学生都被告知无法转移大量学分，面临着可能中断学业或延迟学习的风险，这通常是导致

他们彻底离开大学的现实原因。在这方面，未来的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认证机构、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大学要如何创造性地思考其他学分转移模式。在院校层面，“独立学习”可作为另一种省时的途径，已学有所成的学生可以展示他在一门学科中的专业水平并获得学分，而不必花费额外的时间和金钱来重复学习课程。

每日花销

最后，为就读于大学，特别是农村地区大学的学生补贴交通费用面临困难，这似乎是个小问题，但这些费用和其他日常障碍对于弱势群体学生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事实上，加拿大和其他地方的大学越来越多地在校园内提供食物银行（food banks），为那些努力平衡生活成本的学生提供服务。包括拜罗伊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ayreuth）在内的一些德国大学也提供小额资金来资助运输成本，但这些资源仍相当有限。院校和社会服务机构迫切需要解决学生所面临的这些障碍。

帮助 99% 的学生

鉴于难民涌入，德国三级生态系统的教训不仅适用于正在经历难民潮的其他国家，而且也适用于移民学生正寻求进入大学的其他全球环境。今天这份名单遍布全球：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的最新数据显示，世界各地有 6 560 万流离失所者和 2 250 万难民。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将把教育作为重归正常生活的途径，一些人将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少数人将继续为人类发展做出显著贡献，就像是历史上其他著名的难民所做的那样。我们不能无视他们的潜力，也不能失去他们。

科研人员和实践人员都可以从当代德国案例中了解到最佳实践和共同挑战。在这个协作学习过程中,包括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和加拿大世界大学服

务中心(the World University Service of Canada)等在内的大型教育工作者社区将努力帮助全世界的难民,不只是那 1% 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难民,更是 99% 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的难民。

非洲学术侨民：培训和研究

Claudia Frittelli

美国纽约卡内基公司国际项目官员

电子邮箱: cf@carnegie.org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从 2000 年的约 450 万增加到 2016 年的 880 万人(来自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据)。为满足对新建大学和大学规模不断扩张的需求,包括肯尼亚和南非在内的一些非洲政府制定了目标,或确定了要在未来十年内增加数千名博士毕业生,以提高其学术人员的质量和规模。201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2015 UNESCO Science Report)指出,新增加的入学人数主要集中在新兴工业化国家,高等教育的未来依赖于大学网络,它使大学可以分享师资、课程和科研项目。大学与学术侨民之间的交流正是大学网络中资源共享的有效切入点。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8 年 4 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国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其在欧洲的同伴,2015 年,在年龄在 25 岁或以上的移民中,有 69%的人表示他们至少有过一些高等教育经历。许多非洲大学和院校已开发出创新模式,将侨民联络工作纳入到培养下一代学者的过程中。

科研网络中的侨民参与

非洲数学科学研究所(the African 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科研主席计划(Research Chair program)的目标是使具有两年以上博士后研究经历的非洲优秀毕业生能够在非洲以外的地方就职,同时继续

进行国际级别研究。非洲数学科学研究所设在喀麦隆、加纳、卢旺达、塞内加尔、南非和坦桑尼亚的六个中心招募了八名生活在欧洲和北美的非洲侨民科研主席,任期为四至五年,并计划在 2018 年再度招聘五名主席。非洲数学科学研究所成立于 2003 年,总部位于卢旺达基加利,该研究所招聘有才华的大学毕业,并为其提供就职于技术专业岗位或从事技术领域研究生学习所需的数学知识前沿培训。研究主席通过科研、教学和创建卓越科研小组来支持非洲的科学发展,聚焦于应用数学科学以及国际与非洲的合作。主席的工作包括指导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组织科学活动;协调客座讲师;开展科研动员工作和建设伙伴关系。非洲数学科学研究所与全球 200 多所大学、300 名研究人员和 500 名讲师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年发表约 70 篇经同行评审的科研出版物和 300 篇学位论文。非洲数学科学研究所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科学家一起将学生带入领先的数学科学领域。自非洲数学科学研究所成立以来,已有来自 42 个非洲国家的 1 500 多名学生毕业,女性占比超过 30%。大多数校友都在攻读博士学位或在非洲工作。

学术侨民在院校中的岗位安排

南非开普敦西开普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和莫桑比克马普托的蒙德拉内大学(Eduardo Mondlane University)已计划聘用侨民学者在比较高等教育、科学和创新领域设计新的博士课程,旨在为非洲

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部门培养科研人员和从业人员。与西开普大学的教师一起，来自世界各主要院校的侨民访问讲师为课程设计、研讨会和公共讲座、研究方法短期课程和博士生联合培养做出了贡献。为满足对方法论培训的需求，加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hana）泛非博士学院（Pan-African Doctoral Academy）聘请了20名来自海外的侨民学者，他们与加纳大学教员一起工作。泛非博士学院为博士生和年轻教师提供培训、辅导、职业指导和奖学金支持，其总体目标是提高西非博士生教育质量。自2014年成立以来，泛非博士学院已培训了400名非洲博士生。这一培养方法得到了重视，尼日利亚卡瓦拉州立大学（Kwara State University）和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的副校长也复制了泛非博士学院的培养模式。此外，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金山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健康科学研究办公室（the Health Sciences Research Office）针对在紧缺技能领域有所建树的校友开展互惠科研合作、讲座、研究生指导和实验室共享等。24名侨民校友在四年内到访金山大学，促成了该校与六所一流大学的合作、发表了14份联合出版物、获得了五项联合拨款，并在研究生培养及健康应用数据库的开发上取得了进展。

与学术侨民的联系是否可持续发展？

外部资助者加强了其中几项计划，但这些联系是否可持续呢？卡内基非洲侨民奖学金项目（the Carnegie African Diaspora Fellowship Program）进行了一项调查，该项目自2013年以来支持了335位学术侨民到访非洲大学，调查发现，103名北美侨民研究员在非洲大学获得长达三个月的访问资助，其中98%的人称在获得非洲大学职位之前的最近几年到访过非洲。该调查的回复率为

77%。在最近到访非洲的98%的受访者中，66%的人是因私访非，60%的人是为了开展科研项目。有33%的人访问了其之后就职的院校，35%的人在任职之前曾与该校进行合作。

另一项调查针对的是获得为期6个月的研究员身份学者的情况，78%的项目参与者称他们继续与主办院校合作开展学术活动。对58名研究员进行为期一年的校友追踪调查（53%的回复率）显示，84%的研究员称他们每月至少与来自非洲院校的学者和管理人员进行一次或两次沟通，41%（24名）的研究员指出，出于职业原因，在首次进行项目访问后又再次到访了非洲院校。无成本或低成本技术和连接的进步使得持续协作成为可能。

知识投资有助于实现教育目标

非洲各国政府大都对侨民的回国投资感兴趣，但知识投资提供了实现其教育目标的手段。埃塞俄比亚新任总理艾比·艾哈迈德·阿里（Abiy Ahmed Ali）在2018年4月的就职演说中表示，将尽最大努力确保高等教育机构、技术和职业学院的毕业生“获得与其能力禀赋相当的知识。”他随后呼吁海外侨民做出贡献，并表示政府将继续毫无保留地努力促进他们以任何可能的方式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及国家转型。“下一个爱因斯坦”论坛（the Next Einstein Forum）总统小组会议于2018年3月在卢旺达基加利举行，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称，80~85%在国外留学的卢旺达人因有利的环境而返回到了卢旺达。

高等教育的未来愈发具备跨国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有400万学生（占所有大学生的2%）在国外学习，这一数字到2025年预计将增加一倍。由此，在非洲大学和有兴趣分享知识资本和资源的学术侨民

群体之间建立联系，这将推动学术交流、更广泛的学术团体和高等教育创新。学术侨民连接计划的早期发现表明，对额外资金、专

业知识、技术和善意的充分利用将为学术侨民所就职的居住国院校和非洲院校带来益处。

脱欧后重新定位英国合作伙伴关系

Ludovic Highman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教育学院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全球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re for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高级研究员

电子邮箱: l.highman@ucl.ac.uk

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之后, 脱欧对高等教育和科研带来的影响尚未立即显现, 且取决于英国政府如何解释公投结果并将其作为选择“硬脱欧”或“软脱欧”的指令。两年后, 英国政府在欧盟—英国脱欧谈判中的不稳定立场, 以及内阁分裂为软脱欧或硬脱欧两派, 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英国大学剩余的可用选择。英国大学代表了全球公认的卓越教学与科研的标杆, 有四所英国院校位居大学排行榜前10位(2019年QS世界大学排名)。历史、近距离和有利的支持机制带来了欧洲境内的金融和技术协作(例如, 流动性补助、欧洲学分转移和累积系统[ECTS]承认学生在国外度过的时间等), 这使得其他欧洲大学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英国硬脱欧会破坏这种关系, 欧洲议会的英国脱欧指导委员会得出结论, 虽然英国有可能作为未来科研与创新框架计划“地平线2020”(Horizon 2020)的第三国参与其中, 但这不会导致“欧盟预算到英国的净转移, 也不会赋予英国任何的决策角色”(Times Higher Education, 15 March 2018)。这一现象问题多多, 因为英国一直是欧盟科研基金的纯受益者, 在欧洲科研理事会(the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的大部分拨款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且基于自身利益极大地影响了框架计划的形成。

显然, 双方在高层面上进行扑克游戏,

在达成共识之前不会达成任何协议。与此同时, 大学必须迎合他们现有和未来的学生和员工, 并确保学校本身仍然是具备吸引力的目的地。通过展示对世界开放的教学和科研, 持续提供丰富文化的体验, 大学可以实现这一目的。英国大学如何制定战略, 以保持与欧洲和全球合作伙伴的联系? 如何重申其致力于作为国际组织、不受限于领土边界的角色, 或是尝试解决无益的脱欧所带来的危机——英国大学可能会被孤立?

欧洲所面临的危机

在科研方面, 欧盟的科研与创新框架计划“地平线2020”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科研资助计划, 预算约为800亿欧元(2014~2020年)。它将由“地平线欧洲”计划延续下来, 拟议预算为979亿欧元(2021~2027年)。虽然关注绝对数字很重要, 但金额的绝对大小使其难以承受。在院校依赖方面, 40多所中等规模的英国大学项目中所获收入已超过其从欧盟政府机构所获科研收入的20%。自2014年以来,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 帝国理工学院和爱丁堡大学各自获得了数亿欧元的科研经费。

除科研和创新资金外, “伊拉斯谟+”项目(Erasmus+)是欧盟在欧洲(2014~2020)支持教育、培训、青年和体育的全方位计划, 拨款预算为147亿欧元, 它为学生和教职员

的流动提供了一个运作良好的框架。学生体验的丰富程度难以量化，但却非常真实，学生语言技能得意提升也是一种附加值。欧洲必须设计替代性的流动方案，虽然“走向全球”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但不应就此认为英国学生群体中也存在同样需求。由于相关成本，欧洲内部的流动性仍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并且，因为距离问题及缺乏支持性的资金框架，针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北美的流动机会将变得更加昂贵（且通常无法提供语言学习的机会），

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展望英联邦及其他国家

由于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遗产，英国内部一直在谈论促进英联邦内部的伙伴关系。英联邦是一个政府间组织，由 53 个国家组成，有 24 亿人口，这些国家之前是由英国直接统治的。与欧盟 27 国相比，它是一个更加兼收并蓄的团体。虽然进入这个后殖民组织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目前这些国家中有 31 个是非常小的国家，通常没有注册的公立大学，只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新加坡的科研能力与欧盟主要国家相当，其科研成果和排名靠前的大学数量就证明了这一点。除这四个英联邦国家中的大学外，没有一所大学跻身世界前 150 名（QS 世界大学排名，2019 年）。

聚焦英联邦国家可能会产生有限的结果——除了一些成员国在人权价值观上的差异，这可能会危及英国教职员和在国外工作或学习的学生。英国政府一直强烈主张将卓越与否作为资助科研的唯一基础。我们很难看到英国将资金用于其他英联邦国家的科研基础设施能力建设上，特别是在英国脱欧的情况下——英国将无法进入欧盟框架计划，

并发现自己和其他非欧盟国家一样在与欧盟展开竞争。

大学作为掌控自己命运的主导者？

根据全球高等教育中心开展的有关“英国脱欧、贸易、移民和高等教育(Brexit, trade, migr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的研究项目显示，在领导层，英国研究密集型大学热衷于与排名靠前的大学建立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包括科研合作和流动机会，这些大学中的一系列课程使用英语授课，英国大学认为这些合作伙伴关系反映了自己的地位和声誉。这可能导致一小部分欧洲和国际大学因英国大学要求建立战略联盟而变得不堪重负，因为此类海外院校的名单是详尽无遗的。在排名前 100 位多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荷兰、新西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新加坡和美国的大型研究密集型大学都被视为优先合作伙伴。这种院校性的、大学范围内安排的合理化，可进一步推动流动性和科研合作仅在所谓“志同道合”的西方世界大学之间进行，从而创建基于科研水平和排名的专有联盟。欧洲部分地避免了这种“俱乐部”综合症，因为欧洲大学在“伊拉斯谟+”项目下达成了大量自下而上的安排，主要是基于个人关系以及学者在建立科研交流与合作伙伴关系时的相对自由。在企业大学时代，由于英国脱欧相关的不确定性，这已不再是英国大学的选择。

结语

自英国脱欧公投以来已过去两年，政府对英国参与“伊拉斯谟+”和“地平线欧洲”计划的问题几乎没有明确解释。英国大学对居高不下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大学对其入学时间为三至四年的学生负有责任——大学

通常提前一年开始招生，也对研究人员负有责任，因为他们参与的合作项目的申请时间即将到来。因为学位项目必须包含上课内容，且高质量的科研计划书需要明确的资格，因此，确定性是必要的。英国大学正在寻求加

强与欧洲和海外大学的院校合作关系，以保持国际化导向，避免成为与世隔绝的内向型“孤岛”。英国政府希望其大学能够融入“全球英国”的倡议之中，但却没有提供任何支持性框架。

中国私立高等教育地位的巩固

喻恺

中国教育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China Education Group Holdings Limited) 首席执行官

电子邮箱: kai.yu@chinaeducation.hk

由于竞争的加剧和提高效率的需要, 高等教育, 作为一种产业,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球挑战。在中国, 高等教育的私营部门正在通过收购 (即私人教育集团收购其他私立院校) 而趋同化。

教育市场的黄金时代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市场, 其次是印度和美国。2016 年, 中国高等教育入学人数高达 3 700 万。新兴的中产阶级社会为该行业提供了广阔的机会, 高等教育已成为中国投资的重点领域。德勤 (Deloitte) 的一份报告提到现在是“中国教育市场的黄金时代”。从数量和频率来看, 私人资本流入教育行业的数量迅速增加。德勤表示, 2015 年, 中国教育行业的投资额是 2014 年的两倍多; 合并和收购总额同比增长 165%; 首次公开募股 (IPO) 比上一年增加了 76%。

美国弗若斯特公司 (Frost & Sullivan) 称, 中国私立高等教育行业的总收入从 2012 年的 696 亿元人民币 (约合 101.1 亿美元) 稳步增长至 2016 年的 954 亿元人民币 (约合 138.6 亿美元), 2021 年预计将进一步增加至 139 亿人民币 (约合 202 亿美元), 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学生总数从 2012 年的 530 万增加到 2016 年的 630 万, 预计到 2021 年将进一步增至 800 万。目前, 大约 22% 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正在私立大学学习。三年后, 这一百分比预计将增加到 24%。

中国政府在改善基础教育和中学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成果。然而, 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 仍然需要可靠的私立教育提供者来提供更实惠和优质的教育服务。目前, 中国有 740 多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 数千所私立职业技术学校, 其中大部分由个人创办、资助和运营。许多此类机构的效率和教学质量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分散的私立高等教育产业预计将在未来十年内经历一波整合, 这将进一步增加学生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并促进区域经济的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繁荣。

中国高等教育部门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具有极高的准入门槛。其中一个门槛是对拥有土地和建筑物的要求。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大学在租赁的土地和建筑物上运营并不少见, 但在中国, 土地和建筑物的所有权往往是获得经营许可的前提。这为基本建设支出和准备申请许可所需的时间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 与创建新学校相比, 收购则提供了有效的市场准入点。

包括医疗保健、银行、汽车和电子在内的其他行业也出现了收购浪潮。虽然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但这些活动的目标通常与我们在高等教育中的预期相似, 具体而言, 包括: 确保持续增长和影响, 提高效率, 扩大规模经济, 以及提升质量、声誉和竞争力。

收购达到历史新高

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收购活动最近达到了历史新高，随着高等教育集团争夺市场份额，这种势头仍在继续。中国教育集团于2017年12月成为香港上市公司。四家基石投资者认购该公司的首次公开招股，包括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of the World Bank）、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Investment Corporation）、中国私募股权公司Greenwoods、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Value Partners of Hong Kong）。自上市六个月以来，其股价已上涨超过80%。

随着行业整合和竞争升温，大型企业——它们往往拥有强劲的资产负债表——预计将加大学校收购力度，进一步提升其竞争力。中国教育集团上市融资4.2亿美元。三个月后，该集团收购了位于中国郑州和西安的两所学校。郑州的学校是中国最大的职业学校，拥有2.4万名学生。该校的规模相当于第二到第五大大学的总和。同时，西安的学校是中国最大的技术学院，拥有2万名学生。郑州是中国中部的中心，西安则是中国西部的中心。区域经济正在快速增长，这些区域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很大。

整合是成功的关键

进行广泛的研究势在必行，目的是为了

确定具有最大增长潜力的学校。私立教育集团通常根据学校的位置、学位层次、规模和学科领域等因素对学校进行评估。

对任何行业而言，整合所收购的组织以实现预期的收购目标都会带来巨大挑战。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兼并和收购都未能实现其希望的收益。有人估计成功率不到20%。中国教育集团在推动其学校成为各自所属类别的顶尖成员方面有着良好记录，并因其教育管理系统而获得了国际标准组织的ISO9001认证。该集团的两所大学连续九年成为中国排名第一的私立大学，且连续十年在广东省位居第一。

以课程开发为例，新收购的学校可以在教育集团其他学校资源和经验的支撑下开设新的课程项目，从而减少新学校课程项目开发所需的时间和成本。因此，合并后的学校可以从增加的入学率、规模和课程项目多样性中受益。

展望未来，市场对具有专业技能毕业生的需求不断增加。根据美国弗若斯特公司的资料，中国新生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比例从2005年的35%增长到2016年的45%。为了脱颖而出，私立大学需要通过专注于以职业为导向的教育来提升自己的声誉。这些收购在行业中的成功将取决于教育公司利用其资源帮助被收购学校满足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的能力。

非洲家族式私立高等教育机构

Wondwosen Tamrat

埃塞俄比亚圣玛丽大学 (St. Mary's University) 创始人、总裁、副教授，私立高等教育科研项目 (Program for Research o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参与者

电子邮箱: preswond@smuc.edu.et 或 wondwosentamrat@gmail.com

过去二十年来，非洲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数量激增，其中包括私人或家族拥有的大多数未经审核的院校。关于这类私人机构在全球或区域层面的文章很少。在非洲，关于私立高等教育本身的文献仍然很少。本文广泛探讨了非洲的家族式院校。

存在情况

尽管非洲大陆许多国家都存在大量宗教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但非洲家族式院校的数量目前仍在增加。这一新发展可能部分归因于过去二十年营利部门的崛起。

家族式院校的存在可能受到在特定国家经营的主要私立院校的影响。在刚果、肯尼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家，家族式院校数量有限，但仍在增多，在这些国家中，宗教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宗教”和“家庭式”两种类别并非相互排斥，因为一些家庭或个人参与宗教性（和其他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和/或拥有其所有权。

然而，特别是在贝宁、博茨瓦纳、加纳、埃及、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塞内加尔、南非、苏丹和乌干达等国家，营利部门在与宗教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竞争中取得进展，家族式院校发展非常强势。合法允许营利性私立院校的国家可以为私人/家族式院校提供大量机会。埃塞俄比亚是一个极端案

例，因为大部分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130个认证机构中超过90%的院校）由受利润驱使的家族和个体经营者所拥有。相比之下，在许多国家，家族式院校在私立教育机构中占比可能不超过3-5%。

院校本质

非洲大多数家族式院校都是以职业为导向的非大学或专业学校。例如，非大学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最常见于博茨瓦纳、莱索托、南非和突尼斯等国，而私立大学则位于象牙海岸、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商业导向的家族拥有的私立院校具有需求吸收型、营利性院校的特征。这些院校大都规模较小，提供旨在满足市场需求的课程项目。除拥有者的初始投资外，这些学校严重依赖学生缴纳的学费，很少或是没有外部资助或创收活动。对学费的严重依赖会影响这类院校的结构和管理方式。

尽管在学术上表现优异的非洲私立院校通常是宗教性的，但大多数家族式院校都是教学型院校，很少参与科研和研究生培养。但也有例外情况，例如，摩洛哥政府政策鼓励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争取精英地位。虽然数量极少，但加纳和埃塞俄比亚的家族式院校已成功在课程质量方面赢得了很高的可信度。

优势与缺陷

人们对家族式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广泛接受程度取决于它们能否将盈利能力与高等教育层面所要求的学术方向相协调。尽管存在挑战，但实现这种必要的平衡并非遥不可及，非洲大陆某些院校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成功的家族式私立高等教育机构通常比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更加灵活。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常困扰着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成功的家族式院校的特点是充满活力、创新、效率和灵活性，而这些特点对于院校的成功至关重要。由于学校对确保社会和经济活力的注重，成功的家族式院校最大限度地减少院校支出、促进战略规划和市场营销、与雇主保持联系、提供就业服务、学生咨询和支持，并提高教职员工的责任心。它们能对社区拓展项目做出坚定的承诺，包括提供免费的专业服务、为慈善事业捐款、参与本土项目并开展社会活动（如保护环境、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通过能力建设培训和捐赠来推动社区发展等）。

尽管有些家族式院校是由具备利他主义情怀的所有者所创建的，但很大一部分此类院校所有者的主要目标是获得经济收益。在这些院校中，家族成员可以就职于关键职位，他们在管理院校方面几乎没有受过培训，也没有相关经验。当所有者的准备、愿景和行为与院校需求和目标不一致时，院校活动可能会受到严重损害。与公立院校相比，所有形式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都可能遭受类似影响，但这些影响却在运行不良的家族式院校

中被放大。在非洲各地，许多此类机构被关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所有者过度渴望营利，这损害了优质高等教育的供给。

在几乎没有自我控制的情况下，所有者对院校日常运作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权力也是其社会和学术合法性（这对院校获得广泛接受至关重要）的严重缺陷之一。将其院校主要视为商业实体的所有者可以利用其关键职位来决定院校发展方向和运营。这样的案例在许多非洲国家随处可见。所有者专断的治校模式通常表现在肆无忌惮的扩张、很少关注长期承诺、将赚取的利润转移到非学术活动之中、任意任命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干涉学术事务及强加专制治理制度等方面。有关院校重要问题的重大决策可能不会被公开分享和讨论。不遵循正当法律程序的院校所有者除了打击员工信心和不尊重个人权利和/或学术自由之外，还会损害其校长和/或工作人员的参与、权力和决策权。在埃塞俄比亚，院校所有者的影响显而易见，它通常决定了院校的成败。整个非洲大陆也有类似的情况，有时，这会带来人们对院校运行模式的质疑——就院校运营至关重要的事项而言，这些院校通常在没有法律限制的情况下运作。

总之，家族式私立院校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非洲高等教育之中，人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其性质、运作和潜力，其进步与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部门的相应发展似乎可能会持续下去。然而，人们对此类院校的广泛接受取决于其运作方式和/或院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制逐利的院校所有者毫无远见的想法。

印度棘手的卓越计划

Philip G. Altbach、Rahul Choudaha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科研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Rahul Choudaha: 美国求学之门 (Studyportals) 网站全球参与和科研执行副总裁

电子邮箱: rahul@DrEducation.com

印度有着世界上最为复杂的高等教育系统之一。印度拥有超过 860 所大学和 4 万多所学院, 招收了 3 500 万名学生, 它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教育系统。其独特的公立大学结构, 关联着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教学型学院 (公立或私立), 也形成了在质量上良莠不齐的院校网络。该系统在规模和组织上的特征使其几乎无法管理——不连贯的政策制定和官僚障碍积聚了挑战。现有的质量保证措施也不充分。为解决这些问题,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 印度的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不足。

然而, 印度政府应对全球排名的压力一直在增加。最终人们认识到, 要在全球知识经济中竞争, 印度需要进入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的世界。前任政府在 2009 年提出的首批尝试项目之一就涉及推广 14 所“创新型大学”(Innovation Universities)。由于缺乏资金和新德里政府的更迭, 该计划没有实现。这一计划的翻版, 即现任政府的“杰出院校”(Institutions of Eminence) 倡议, 提出了建立 10 所公立和 10 所私立全球竞争性大学的目标。

“杰出院校”计划中“卓越竞赛”的获奖者名单现已公布。只有六所院校入选, 因为政府只能承担对这些学校进行额外投入, 且其中只有三所院校能够得到政府资金。此

外, 这六所学校没有一所获奖院校是多学科院校 (这是所以学术体系的核心)。获选的一所公共院校包括: 班加罗尔的印度科学研究所 (the 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 Bangalore), 分别位于孟买和德里的两所印度理工学院, 它们都是以技术导向的院校。三所私立院校是位于毕拉尼的 Birla 技术与科学研究所 (the Birl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马尼帕尔高等教育学院 (the Manipal Academy of Higher Education) 以及筹备中的 Jio 研究所 (Jio Institute)。

公立院校将在五年内获得相当于约 1.5 亿美元的资金; 私立院校无法获得政府资助, 但获得了院校自治权, 且在政府法规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虽然三所院校可获得的 4.5 亿资金是“严格的资金”, 但它绝不是变革性的。事实上, 与其他国家 (如中国、俄罗斯、德国和法国) 的卓越计划相比, 这一金额微不足道。增加的资金将帮助选定的院校开展创新活动, 或是帮助其提高学术工资以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但却不会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如果“杰出院校”计划中的院校只注重有助于全球排名以及能够有助于其改善排名表现的变革, 那么它们将错失重要改革的巨大机会, 且不太可能产生提升排名位次的结果。

Jio 研究院和绿地项目

在最近出版的《加速大学发展：结合思想与金钱以获得学术卓越》（*Accelerated Universities: Ideas and Money Combine to Build Academic Excellence*）一书中，Altbach、Reisberg、Salmi 和 Froumin 指出，创建一所拥有世界一流愿景的新大学比试图改革抵制变化的现有大学更为可取。虽然创建一所新大学是一项高风险和高要求的工作，但通过良好的领导力和资源组合，大学可以快速实现卓越。在“杰出院校”倡议的背景下，“绿地”实验也存在风险，但事实上，几乎所有印度顶级学术院校都是这些举措的结果。第一个印度理工学院成立于 1951 年，它是在外国合作伙伴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顶尖学校，因而无需与传统大学中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打交道。Birla 技术与科学研究院（1964）和马尼帕尔高等教育学院（1953）这两家私立初创企业都属于当时的绿地项目。

Jio 计划由印度最富有人士和世界排名第 14 的富豪 Mukesh Ambani 资助，后者是印度家喻户晓的名字，拥有印度瑞来斯实业公司（Reliance Industries）和手机服务。Jio 计划在印度并不罕见。但它面临着重大挑战，例如明确其基本组织原则。在印度和国外，它将如何与其他大学区分开来，同时与其他地方的最佳学术实践相匹配？虽然瑞来斯实业帝国是印度最大的私营企业，但创建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成本令人生畏，尤其是从头开始。例如，2009 年在沙特阿拉伯成立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the King Abdull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在其设施上花费了 15 亿美元，且拥有 100 亿美元的捐赠，该校目前有 900

名硕士和博士生就读。

Jio 研究院与世界一流理念

虽然每所世界一流大学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共同要求。在《世界一流大学：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例研究》（*The Road to Academic Excellence: The Making of World-Class Research Universities*）一书中，Altbach 等学者提出了三个基本要素：人才、资源和良好的治理。当然，这三个要素对于所有入选“杰出院校”的学校都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需要关注 Jio 研究院的具体需求，因为我们认为它面临着独特的机遇和挑战，且似乎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努力。我们已经提及资源，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特别是因为没有公共资金可供 Jio 或其他私立院校使用。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人才（教师和学生）和治理方面。

教师是大学的核心，影响着实现和实施大学使命的各个方面。在追求排名位次的情况下，科研成果是一个关键指标。因此，吸引顶尖的研究型学术人才不仅需要物质资源来给予教师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薪酬，且还要为其家庭成员在校内外提供有吸引力的生活质量。Karjat 市距离孟买机场有 2 小时车程，它能否能提供对于吸引国际最优人才至关重要的生活环境呢？

学生对印度优质教育的需求依然强劲，瑞来斯实业品牌和创新课程在吸引国内顶尖学生上相对容易。但是，真正的挑战是吸引国际学生。国际学生的决策过程很复杂，最好的学生可以选择全球范围内的众多高校。例如，对国际学生和教师而言，“研究院”不如“大学”广受认可。瑞来斯实业、巴尼家

族或 Jio 这些品牌能否打入全球市场并影响学生对印度和 Jio 研究院的选择呢？

“杰出院校”计划的一个积极因素是高度自治，不受政府政策和监管限制。然而，Jio（以及其他入选该项目的学校）需要在组织和治理方面拥有创造性的想法。例如，与自上而下的任务相比，决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协作和教师参与？毕竟，顶尖大学不是商业企业，而是创新型学术社区。传统的企业管理风格与创新型大学的治理期望并不一致。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项资源密集型和具备高度创造性的努力，它考验着各个国家的耐心和不懈努力。印度高等教育迫切需要卓越院校的榜样。通过“杰出院校”计划，实现在印度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壮志需要资源、人才（教师和学生）和治理上的一致性。

注：本文的早期版本发表于《印度报》（*The Hindu*）。

印度的省级高等教育政策

Anamika Srivastava、Nandita Koshal

Anamika Srivastava: 印度索内帕特县 O. P. Jindal 全球大学 (O. P. Jindal Global University) 国际高等教育科研和能力建设研究所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Capacity Building) 助理教授、研究员

电子邮箱: anamika@jgu.edu.in

Nandita Koshal: O. P. Jindal 全球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科研和能力建设研究所研究助理

电子邮箱: nkoshal@jgu.edu.in

现在,重点发展一些“顶尖”国立研究型大学是许多国家政府有意识的高等教育政策选择。政府这样做的目标是在全球大学排名中占据一席之地,有时也会以忽视更大的高等教育格局为代价。在印度,联邦政府建立一些“杰出院校”(Institutions of Eminence)的最新举措值得称道。但是,在发展“杰出院校”的宏伟愿景中,政府不应忽视对其省级教育体系的改革。

所有印度大学或大学层次的院校(有权授予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都是根据《印度议会法》(the Act of the Indian Parliament) / 《联邦政府法》(Federal Government Act) 或省政府法案制定的。大多数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如印度理工学院(the 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印度管理学院(the Indian Institutes of Management)、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和德里大学(the University of Delhi)都是由联邦政府建立和资助的。然而,省政府建立的院校在印度高等教育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省级院校包括公立大学、其附属学院和私立大学。印度高等教育机构中的近96%是“省级院校”。印度总入学人数的近84%和总教学人员的92%属于省级院校。然而,当谈到排名框架中的表现时,很少有省

级院校“表现良好”。根据旨在对印度高等教育机构进行排名的“国家院校排名框架”(the National Institutional Ranking Framework),2017年只有20个省级院校入选前100名。在最近发布的2018年QS金砖国家排名中,有65所印度院校位居排名前300位,其中只有29所省级院校。

虽然在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话语中常被忽视,但省级院校迫切需要财政资源和治理改革,也迫切需要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对财政资源的需求

虽然联邦政府院校由联邦政府资助,但省级院校是印度高等教育的主要部分,由省政府、联邦政府和私营部门提供资金。据估计,在2014~2015年,公共高等教育支出总额的63.48%是由省级政府支付的,只有36.52%是由联邦政府支付的。但是,由于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在经济上依赖省级政府,因此省级政府的人均预算支出与联邦政府相比非常低。虽然各省之间高等教育支出的变化可能与省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政治愿景相关,但这会影响高等教育的质量。另一方面,省级院校得不到联邦政府的支持。在2016~2017年,联邦政府通过高等教育部门将高等教育总预算的6%转移到了省级政府。

2013年,全国高等教育代表团(the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Mission,也称为Rashtriya Uchcharat Shiksha Abhiyan in Hindi,或RUSA)是一项由联邦和省级政府共同资助的计划,旨在为省级院校提供资金。根据全国高等教育代表团网站上的数据,截至2017年1月,在第七期计划期间(2012~2017年)承诺的中央基金中只有12.39%已经向各省发放。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各省无力提供其财政份额,省级院校无法证明其财务需求的合理性。

外部治理改革

除了金融改革外,省级高等教育还需要进行外部治理改革。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中维护和协调质量的任务是联邦政府的责任。这意味着省级高等教育监管机构将负责执行联邦级监管机构(如大学拨款委员会[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全印度技术教育理事会[the All India Council for Technical Education],印度律师协会[the Bar Council of India]等)的行政管理职责。由于批准程序的限制,在省一级进行创造和创新的空间很小,遵守联邦规则和监管行为是首要的制约因素,阻碍院校寻求解决日常问题的能力。

内部治理改革

就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而言,从属关系改革相当重要。在印度,学院必须正式依附(附属)大学,大学负责支付资金并向附属学院提供信息、人力和中央指令。反过来,该学院从该大学处获得认可。除管理考试、公布结果以及录取过程外,大学还负责向学院传达政策、改革和计划信息。另一方面,学院负责实施其所附属的大学下达的办公室

命令,收集这些命令的执行证明并与大学沟通。在印度,一所附属型大学平均与143所院校相关联,(北方邦的省立大学Chatrapati Sahuji Maharaj Kanpur University有896所附属学院),这些数字表明大学和学院在多大程度上承担了更多的行政责任。实际上,负担过重的大学往往将其行政负担转移到其附属学院。因此,需要对此种关联进行紧急的内部治理改革,宣布一些大学自治,并在日常治理中采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学术劳动力的“合同制”

迫切需要人们关注的一个相关问题是“合同制”的兴起和学术劳动力的临时化。学校聘用的短期非永久性合同制教师被称为临时教师。这类教师减轻了经济负担,除承担教学任务外,他们承担更多的行政责任,且可以轻易被“雇用和解雇”,因此,这类教师成为院校的首选方案。与联邦政府资助的院校相比,省级院校劳动力“合同化”的程度更高。根据全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高等教育调查报告,2011~2016年,省级院校雇用的临时教师总数增加了71%,而联邦政府资助院校中的此类教师增加了52%。

结语

印度的省级院校迫切需要政府的关注,而不仅仅是联邦政府和省政府的零碎努力。根据评估全球研究型大学的参数判断省级院校的绩效是不公平的。省级公立院校须要满足解决年轻人对于可负担得起的大学课程/学位的需求。主要以负担得起的学位满足年轻人群的需求。虽然印度已踏上建设部分世界一流院校的征途,但它不应忽视省级院校对高质量及价格合理的教学的需求。

印度高等教育中的教学情况：六项改进原则

Sayantana Mandal

印度新德里国家教育规划与管理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助理教授

电子邮箱: s.mandal@nuepa.org

有效的高等教育教学在促进学习者、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令人惊讶的是，直到最近，印度还没有关于如何改善高等教育机构教学的大规模实证研究。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the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首次完成了一项名为“印度高等教育教学与学习”(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Indian Higher Education) 的重要研究，该研究收集了本科和硕士阶段的课程以及各主要学科的实证数据。该研究表明，在本科和硕士阶段的教学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教师、学生和行政部门之间存在严重脱节。这就表明了为何印度高等教育部门的教学在促进学习方面基本无效。我们的分析提出了改善印度高等教育教学的六个关键原则。

本科和硕士阶段的教学

作为一种常见的做法，印度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师急于完成其教学大纲，并倾向于使用暗示性教学（侧重于期末考试），而分析性教学则退居二线。因此，在大多数本科课程中，教学是非交互式、单向的、单调的。诸如计算机和投影仪之类的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仅仅取代了传统的黑板，且除了提供文本信息之外很少使用。虽然大多数学习材料都是英文的，但在教学中主要使用地区语言以便于理解。

在硕士阶段，教学通过信息导向和互动

讲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师经常鼓励在课堂上进行讨论，且更愿意融入和整合学生已有的知识。虽然许多人继续以传统方式进行教学，但有些教师会根据学生的要求调整自己的风格。与本科课程不同，英语被用作主要的教学媒介语，与地区语言一起使用。然而，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仍与本科阶段的教学情况大致相似。

脱节

有趣的是，同时教授本科和硕士课程的教师可以任意切换教学风格，从本科教学中信息导向式的单向教学转变为研究生课程中更具互动性的教学风格。然而，两个学位阶段的学生都偏好互动式教学。确切地说，他们都更喜欢知识渊博、乐于互动、充满激情、友好且思想开明的教师——这是案例院校中学生们所认为的有效教师的五大首选特征。

院校管理者将教学效率低下归咎于教师短缺和大班授课（有时在一个教室中有 150 名或更多的学生）两个原因。另一方面，教师则抱怨教学大纲过于繁琐、行政工作量过多，以及学生缺乏良好的英语语言能力。这些因素常迫使他们使用区域语言进行规范性和常规性教学。

主要原因

本研究发现，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以来，印度的高等教育管理大大减少了大学教

师的自主权。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角色已经被简化为大型等级组织的员工。这种情况与缺乏严格的教师培训一并导致了教学效率的降低，尤其是在本科阶段。在硕士阶段，教师使用不同的方法，但对这些方法是否有效的后续评估工作相当有限。他们很少和学生交流以获得详细的反馈和公开讨论面临的挑战。缺乏对现代互动式教学法的培训和接触，以及持续的传统教学实践，导致了以信息为导向的教学文化以及人们对此种文化的被动接受。在没有经过适当培训的情况下，大规模招聘收入微薄的合同制度教师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六项改进原则

- **管理以信息为导向的教学：**教师和教师培训师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采用工具性方法管理以信息为导向的、基于理论的教学。重要的是制定战略计划，重新设计教师作为导师、辅导员和协作专业人员的角色。印度应该（重新）建立国家和州一级的机制和行政机构。

- **推进互动式教学：**以互动式方法颠覆单向教学根深蒂固的文化非常困难。通过采取各级教育的小规模渐进式步骤可以解决这一挑战。教师必须通过引入更多交互式方法来升级他们的教学实践。毋庸置疑的是，专注于分析式和对话式教学法的教师培训将有所帮助。

- **在常规课堂教学中融入信息与通信技术：**为学生和教师提供真实的在线资源来改善数字内容库是必要的，从而帮助学生提前准备课程。因此，课堂教学时间可以更有效地用于讨论和批判性反思。在线的院校内

和跨院校论坛将有助于确定挑战并提出创新性解决方案。

- **包容性方法：**在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背景下，教师需要管理多样化的教室。实际的解决方案，如英语和地区语言的结合使用，最初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授课内容；但为了获得可持续的收益，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必须得以提升。建立语言实验室将非常有益。应支持专门的语言培训和支持，以帮助学生获得不同程度的语言能力。

- **来自学生的建设性反馈：**包容性的另一个步骤是学生的反馈。它不仅可以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方法，还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学生的困难。虽然公开讨论和匿名反馈可能有助于确定学生面临的挑战，但教师、学生和管理层之间的定期会谈对于重建断开的连接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相互之间存在信任，学生会更多地提供关键反馈信息。

- **全面改善基础设施、管理意识和敏感性：**在某些院校，基础设施需要彻底改革；其他院校需要升级实验室、提供常用材料，并改善其信息与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所有院校都需要现代语言实验室。至关重要的是，院校管理部门需要了解教学过程的关键以便提供充分有效的支持。

结语

印度需要立即提高其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只有在具备奉献精神和稳健规划的情况下实施上述六项原则才能有意义。考虑到最近在印度改革教学的推进举措，我们希望多层次和渐进式的实施方案将确保印度高等教育的成功和持续发展。

印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艰难的现实

Mona Khare

印度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教授、印度国家教育规划和管理研究所教育财政系主任
电子邮箱: mona_khare@rediffmail.com

虽然许多学者对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据理力争,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宣扬响应市场、基于技能的教育重要性。“就业技能”概念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雇主和雇员关注的焦点。在过去 20 年中,就业能力的定义已从需求导向的技能合集转向更加全面的“毕业生特质”(graduate attributes)观点,包括“更柔软”的可转移技能和以人为本的品质,并与专门的学科知识、技能和能力共同发展。在充满活力的劳动力市场和快速变化的技术背景下,还需不断“重构技能”和“提升技能”。通过人文教育和专业培训塑造整体人才,增加他们获得可持续就业的机会——这种要求对全球高等教育系统带来严峻挑战。在印度这样的国家,这一问题更为严重,不仅是因其人口规模庞大,且由于年轻群体的人口膨胀,导致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教育部门供应不足。

糟糕的毕业生就业能力

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印度就业市场受到毕业生劳动力不平衡的困扰。这种不平衡与低就业率增长的结合导致了不稳定的情况,且大学毕业生水平一直低于要求的标准。据估计,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工科毕业生和只有 10% 的其他专业毕业生可以就业。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被迫从事远远低于其教育资格的工作或走入不太顺利的创业道

路。这造成了一种新的需求,即供给不平衡,高等教育毕业生既是训练过度的(在低于其教育水平的行业工作)却又是训练不足的(无法进入更高水平的行业就业)。毕业生还被迫通过以其他形式的技能型教育进一步补充其正规大学教育,这导致了高等教育学位的新形势——由收取高额学费的、未经监管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带来了教育公平和质量的挑战。下面本文将重点介绍解释供需不平衡的一些例子。

- 通用性 vs 技术/专业性学科: 尽管在过去几年中,找工作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一直在快速增长,但就其所学专业而言,大多数毕业生来自通用学科,艺术毕业生位居榜首。同时,就需求而言,即便在非技术行业和专业职能部门,雇主们也在寻找拥有专业性和技术性能力的毕业生。数据显示,超过 70% 的大学学位持有者目前从事服务业,其中 IT/IT 关联服务和金融服务领域的比例超过 50%。这种现象可能有两种原因。首先,与工程和科学相关的行业和职业近年来一直是世界主要地区就业指数的前五名之一;其次,相比之下,这群毕业生更能掌握 21 世纪的关键技能,因为他们来自印度更高的社会文化和经济阶层,拥有更好的学术背景。因此,相当一部分毕业生难以找到工作,因为文科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比专业型毕业生要窄。

这里的挑战是双重的。首先，要鼓励和培训年轻人投身于经济中其他不断发展的部门；其次，要在充满活力、不断变化、注重技术的IT关联服务和金融服务行业（这些行业雇用了绝大多数毕业生）中频繁升级和更新技能传送方式。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非技术性的、通用的和社会科学课程项目中最大的毕业生群体是具有广泛社会经济知识的通才，但他们却没有适合特定就业领域的任何专门技术技能。

- 质量：数据显示，印度有相当多的人需要技能培训，因为印度劳动力的特点是知识基础薄弱。在2020年，印度将拥有5亿熟练的劳动力，25%的人处于“大学+”水平，这一比例相当于1.25亿人。在新知识和技能领域教育和培训这一庞大群体令人望而生畏。虽然行业需求正在快速转变——从基础到专业化，这是由于工业转型向更高的自动化和复杂化迈进，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发现自己无法通过课程调整或产学合作来应对这些挑战，这里牵涉了各种原因，从基础设施到财务到人力资源的限制。除了顶端的一些优质院校外，该系统正在培养只具备基本技能，且通常质量较差的毕业生。

- 学位 vs 文凭的不平衡：印度有一个强大的“学位 vs 文凭”禁忌。学位与文凭持有者的比例约为2:1，而1:3的比例对经济最有意义。一方面，公立院校提供的文凭

课程很少，这类课程主要收取高额费用的私立院校提供；另一方面，社会对在就业市场中学位有用性的看法是：文凭附带的声望值很低。这些都是年轻人在选择课程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 公平性：最后，就业技能方面的差异具有区域性、社会经济性和性别内涵。诸如家庭和文化背景、居住地、早期教育的质量和类型以及获得额外学习机会的能力等多种因素都会导致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就业能力差异。农村和半城市中心的技能问题要严重得多。研究表明，一线到二线城市的技术毕业生就业能力差距几乎达到50%，而来自其他城市的毕业生的就业率要高得多。来自社会和经济贫困阶层的女孩和毕业生面临更多不利条件。

结语

在确保质量和公平的同时培养可就业的高等教育毕业生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印度的高等教育需要从“教育本身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到“教育是为了就业”而转变，通过从战略上纠正严重的系统性不平衡，并注重“可持续就业技能”项目，从而促进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转型。

注：本文基于印度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一项正在进行的研究。

研究生工会化：一个独特的美国问题？

Ayenachew A. Woldegiyorgis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博士生、研究生助理

电子邮箱：woldegiy@bc.edu

自世纪之交以来，研究生的工会化已成为席卷美国各地私立大学的现象。在学生生活这样更广泛的背景下，并受各州法律的约束，公立大学的研究生工会化历史悠久且范围更广。尽管工会化进程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但由于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在过去 15 年左右的连续领导下，私立院校对研究生工会的需求也在增加。随着推动工会化发展的势力愈发强大，加之大学管理部门出现的相关阻力，在几个校园中都出现了工会化进程的紧张局势甚至中断。虽然这个问题在美国仍存在争议，但本文试图在其他地方找出可比较的做法。

一般分类

从广义上讲，研究生工会可分为两大类。一方面，在更传统的“学生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学生（通常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聚集在一起的集体定义为工会。这些工会，在不同的国家叫法也不同（如协会、工会、行业协会、议会、政府、组织等），它们不仅在与自己直接相关的事项上，且在一系列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发声。另一方面，研究生工会，有时也被称为研究生员工工会，这种工会类型目前是美国私立大学的热门话题，代表了特定类别研究生的利益。它们尤其关注为大学提供服务以换取补偿的研究生的福利和劳工权利。

组织

在欧洲的几个国家，包括丹麦、芬兰、德国、荷兰、挪威和瑞典，博士研究生被视为员工而非学生。因此，他们可以成为各工会的成员。例如，瑞典大学教师协会（the Swedish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由 23 个独立工会组成的协会）和芬兰大学研究人员和教师联盟（the Finnish Union of University Researchers and Teachers，是该国最大的联盟）都欢迎满足既定条件的博士研究生加入。在后一组织中，学生必须与大学签订至少一年的工作合同。

在其他情况下，研究生工会可以被组织为其他部门工会的延伸，例如美国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和加拿大的加拿大公共雇员联盟（the Canadian Union of Public Employees）。在其他地方，如澳大利亚和英国，研究生工会属于学生组织的保护范围之内，且通常得到所属大学的支持。

目的

在美国，研究生工会将自己视为工会的延伸，从中获得支持。它们寻求法律授权，代表研究生进行集体谈判，特别是合同谈判，其中包括薪酬、福利和工作条件等。在加拿大的一个类似案例中，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几个主要院校都拥有教学和科研助理联

盟。首个这样的联盟于1973年在多伦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成立，在1975~1977年间，它有效地为缩减薪酬差距进行了谈判，并制定招聘、申诉和争议解决程序。

虽然大多数地方学生会的主要目标是代表和捍卫普通学生群体的利益，但即便是那些专门针对研究生的少数工会在某些方面也与美国研究生正在进行的工会化努力不同。例如，剑桥大学的研究生联盟（英国极少数专门为研究生设立的学生会）称其成员在“教育上的进步”是其主要目标。该联盟旨在增加其成员的利益和福利，成为其成员与大学和大学外部机构之间的渠道，并提供社会、文化、体育和娱乐活动。研究生联盟的目标和重点在英国的其他顶尖院校中也是如此，例如约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York）、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和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Kent）等。

同样，在澳大利亚，如在墨尔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等著名院校的研究生协会以及澳大利亚研究生协会理事会（the Council of Australian Postgraduate Associations）都旨在促进学生的一般教育福利和其他利益。作为研究生的全国代言人，理事会是相关问题的权威信息来源，并与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合作以影响高等教育政策。

然而，将美国的研究生工会描述为完全关心其成员利益的组织不太公证。虽然经济利益和工作保障是主要问题，但不同院校的工会活动组织者也提出了教育和非教育问题，包括教育质量、性别关系、多样性和包容性、性别认同、移民和无学籍学生等。

会员资格

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研究生工会的会员资格是自动生成的，一旦学生在各大学的任

何一门研究生课程中注册，包括硕士研究生课程，他们就自动成为工会成员。入学期间没有与大学就业有关的要求。事实上，在某些院校（如剑桥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非学生身份的研究人员和博士后、来自其他院校的访问学者、以及正式成员的配偶或伴侣都有资格成为工会“准成员”，且受益于工会所提供的不同服务。在其他院校（如约克大学），应届毕业生有资格成为会员，并可担任工会领导职位。工会通常隶属于大学，并像其他学生组织一样获得支持。

在美国，成为工会会员的资格受到就业条件的限制。事实上，几十年来，研究生教学助理和科研助理是否能够加入工会的问题一直存在于他们是否可以被视为雇员的问题上。在最近的裁决中，2016年，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广泛定义了允许任何人（包括本科生）获得集体谈判的要求，只要他们为大学提供服务以换取报酬。这可能会继续使会员资格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般而言，关于研究生工会化的文献揭示了三种趋势：具有雇佣合同的研究生通常被视为雇员并能够加入工会（如在芬兰、瑞典等国）；研究生被视为学生，仅由一般利益联盟/协会代表（如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研究生被同时视为学生和雇员，能够参加工会（如在加拿大和美国）。美国的独特之处可能在于无论多么有争议，工会化努力都可能继续蓬勃发展，这或许是由反对高等教育机构日益增长的公司化情绪所推动的，这些高等教育机构“剥削”研究生和兼职教师。可以想象的是，不断增加的学杂费使毕业生承担了大量债务，再加之整体分裂的政治气候，导致了这种情况的进一步恶化。

美国本科教育的未来

Michael S. McPherson、Francesca B. Purcell

Michael S. McPherson: 美国斯宾塞基金会 (Spencer Foundation) 名誉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本科教育未来委员会 (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联合主席

电子邮箱: mmcpherson@spencer.org

Francesca B. Purcell: 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教育和知识发展项目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program) 主任

电子邮箱: fpurcell@amacad.org

大多数国家普及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进展缓慢而艰难, 但随着时间推移, 全球趋势是为更多来自不同背景和地区的学生提供更多机会。在美国对年轻人教育扩招历史的基础上, 美国现正在接近高等教育普及, 近 90% 的高中毕业生在青年时期就读于两年或四年制的学院或大学。但不幸的是, 美国必须解决严重的局限性, 以让更多学生获得大学教育带来的经济和个人利益, 并使美国继续作为一个充满经济机会的民主国家持续运行。为确保学生获得所需的教育, 我们必须关注学业完成率和 (教育) 可负担性, 同时更加强调教育质量。

增加学业完成率和可负担性

正如全世界许多高等教育机构一样, 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也在与学业完成率和教育的可负担性努力抗争。在美国, 毕业的学生数量太少, 只有约 55% 的学生完成大学本科学业。越来越多的学生借钱支付大学学费, 超过 60% 的学生获得贷款; 那些没有毕业的人最有可能无法偿还贷款, 这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经济机会。对于被忽视的少数族裔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 这些障碍尤为严重, 这意味着该国错失了大量的人力潜能。

许多院校、政策小组和研究人员现在都专注于学业完成率和可负担性, 许多有希望的实践都显示出可靠的成果。例如,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在几年内将学业完成率从 63% 提高到 79%, 该校使用数据来识别障碍并使用支持体系以帮助学生。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基于收入的贷款计划是帮助降低违约率的典范, 美国应该借鉴这些模型。

除学业完成率和可负担性外, 美国还需要更加关注大学期间的学习目的以及我们如何切实实现未来繁荣的承诺。

更认真地对待大学教学

在美国, 有关职业教育与文科教育价值的争论由来已久, 但这种分裂是错误的选择; 大学毕业生需要掌握一系列学术、实践和公民技能。除了技术和实践技能之外, 每个领域的学生都需要整合与人文相关的能力, 如沟通、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合作。学生们可以更有效地工作, 参与社区活动, 并获得终身学习的机会和技能。

在过去 40 年间, 越来越多的研究项目加深了我们对人们学习方式的理解, 反过来也让我们深入了解教师如何进行最有效的教

学。该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基于实证的教学实践，这些实践与一系列积极成果相关联，包括增加学生学习机会、减少成就差距和提升学习持久性等。尽管优质教育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教与学关系，但在全美4700所高校中使用循证教学技巧并非常态。

在许多院校中，教师的科研工作比教学工作更受关注。除学生问卷之外，对测量和观察教学表现的关注相对较少，而学生问卷只是衡量教学表现的弱指标。我们认为有效的做法并未被广泛使用。例如，K-12教育部门表明，让训练有素的人员对教室进行认真观察，并以条理清晰的方式提供反馈可以非常有效地改善教学表现。然而，这种做法远非美国大学教室中的常态。

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大学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教授本科生，但他们往往很少获得相关的初期培训、持续支持或是外部认可。此外，大学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临时”教师，这是一种国际趋势，它允许院校更多依赖短期兼职教师以节省资金。这类教师薪水较低，福利很少，工作保障可忽略不计，且往往在学校治理中缺乏发声机会。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通常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与学生相处。然而，临时教师现在至少占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教学人员的一半，占两年制公立社区学院教学人员的80%以上。

总之，大学教学需要人们加倍重视。即使美国毕业生人数增加且降低了债务水平，但如果学生没有获得足够的知识、技能和良好的态度来维持生活的话，这将是一个毫无意义且代价高昂的表面性“胜利”。

不断推进

要想改变根植于学科专业知识（以及教学专业知识）的教学工作者，并非易事。高校首先需要明确表示自己对教学的关心。在

教师晋升或续约的评估工作中，更多院校应更加重视有效的教学实践。这应伴随着为教师提供指导和其他结构化资源。应给予那些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改善其教学的教师们一定嘉奖。

院校必须乐意寻找资源并下定决心以改善兼职教师的工作条件，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长期合同使这些这类教师获得全职职位。我们认为，对于这些教师中的许多人来说，受到尊重以及在院校治理中的发言权至少与其薪水中的额外收入一样重要。如没有这些变化，院校很难以任何实质性的方式取得进步。

我们还必须重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教学专业人员意味着什么？在一些硕士和博士课程中，所就读的学生将继续在高校内开展教学工作，因此，有意义的教师培训机会应包含在课程项目之中。虽然有很多博士生继续开展全职教学工作，但目前看来，博士学位几乎完全是一个研究学位，而非教学学位。

尽管美国高等教育面临巨大挑战，但也存在让人乐观的真实理由。就对接受大学教育所获好处的所有疑虑而言，大学教育实现了对更多的个人和社会繁荣的承诺；更多院校正在改进针对研究生的工作；各类技术的运用进一步增加了学生的成功率。大学并非保证每个学生都能获得进步，只有持续努力才能实现梦想。但如果我们能够专注于工作，将耐心与紧迫感相结合，我们就可以通过本科教育推动个人乃至整个国家取得巨大进步。

注：如需阅读《本科教育的未来》(*The Future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美国的未来》(*The Future of America*)以及由本科教育未来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发布的其他出版物，敬请访问：www.amacad.org/cfue。

